

# 全球对话

10.3

##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 与 Robert Kuttner 谈社会学

Johanna Grubner

### 气候与变迁

Md. Rezwan Siddiqui  
Markus Wissen  
Vishwas Satgar  
Joan Fitzgerald

### COVID-19: 大流行与危机

Mahmudul Hasan Laskar  
Attila Melegh  
Iliana Oliví, Manuel Gracia  
Brigitte Aulenbacher, Petra Ezzeddine,  
Dóra Gábríel, Michael Leiblfinger,  
Kinga Milankovics, Veronika Prieler  
Dev Nath Pathak  
Michele Grigolo, Craig Lundy

### 理论观点

Syed Farid Alatas

### 悼念 Yogendra Singh

Mir Suheel Rasool

### 重新想像社会

S.A. Hamed Hosseini  
Barry Gills  
Scott Timcke  
Shelene Gomes

### 斯里兰卡的社会学

Siri Hettige  
Subhangi M.K. Herath  
Kalinga Tudor Silva  
Farzana Haniffa  
Premakumara de Silva

### 议题开讲

> 中国塑胶废弃物议题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0卷 / 第3期 / 2020.12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 主编的话

本期「社会学对话」专访知名记者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他在著作中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作品与当今社会发展对话。由二十世纪初的政经局势出发，访谈讨论全球化当前的趋势、探讨强大的国家经济以强化民主决策的需求，以及包容或反对国际移民增加的问题。

我们第一个专题将探讨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气候变迁。一方面，文章暂时不先直接回应生态议题，而是先探讨气候变迁对社会的影响(如民主或移民问题)。另一方面，本章节的重点贡献是针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环境破坏提出可能的替代方案。

正如我们撰写的，COVID-19疫情与其影响仍以不同方式主宰着世界多数地区。正因如此，我们增加收录有关COVID-19章节，以收集来自全球的分析资料。包括印度与欧洲在居家隔离期间，从居家照护、慈善体系与移民制度，到公共社会学的可能性等主题，本节将带我们一窥这些领域当前的讨论。

COVID-19的危机也是Syed Farid Alatas对社会学思潮与理论在整体社会中产生作用与影响，并进行深刻反思的起点。

本期杂志向今年刚去世的印度社会学先驱Yogendra Singh致敬，他对印度传统和现代化的后殖民研究都具开创性。

有三项贡献旨在重新想像社会，并反思当前的发展与社会学的重要性。S.A. Hamed Hosseini 与 Barry Gills 提出一种颠覆性的观点，而Shelene Gomes 与 Scott Timcke 则探讨要怎样由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社会。

这一期的区域焦点着重在斯里兰卡的社会学研究。本章节由Siri Hettige共同编撰，着重在介绍该国充满活力的学科，从对斯里兰卡暴力冲突的分析，到关于团结的问题，本章提供对该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历史的深刻见解。

最后，「议题开讲」重回全球化与生态灾难议题，探讨在中国的塑胶垃圾危机。■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对话》主编

- > 全球对话以多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
- > 投稿来信寄给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mailto: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 编辑团队

主編：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編：Aparna Sundar.

执行主編：Lola Busuttill, August Bagà.

顾问：Michael Burawoy.

媒体顾问：Juan Lejárraga.

編輯顾问：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各国編輯：

阿拉伯：(突尼西亚)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阿尔及利亚)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j; (摩洛哥) Abdelhadi Al Halhouli, Saida Zine;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国/西班牙：Lola Busuttill.

印度：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Pragya Sharma, Manish Yadav.

印尼：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Faezeh Khajehzade.

哈萨克：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兰：Beata Maluchnik, Justyna Kościńska, Jonathan Scovil, Sara Herczyńska, Weronika Peek, Kamil Lipiński, Aleksandra Wagner, Aleksandra Biernacka, Jakub Barszczewski,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Gabler, Iwona Bojadziejewa.

罗马尼亚：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Bianca Mihăilă, Alexandra Mosor, Maria Stoicescu.

俄罗斯：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Valentina Isaeva.

台湾：李宛儒, 林玟圻, 吕道詠, 洪柏勝, 陳昱嘉, 黃昱閔.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本次专题介绍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气候变化，我们讨论其对社会的影响，这些影响并不常备与生态问题连结，比如民主和移民问题，但也勾勒出避免资本主义进一步破坏环境的可能替代方案。



全球对话继续就不同国家因新冠肺炎而面临的当前形势和危机开展讨论。印度和欧洲的学者，对于居家照顾、慈善、移民、封锁期间公共社会学的可能性等议题有诸多叙述，这个特殊专题提供我们的学科中对于当前议题的讨论概览。



本节着重于斯里兰卡的社会学，强调该国充满活力的学科，从暴力冲突问题到斯里兰卡的团结问题。该部分也让我们深入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2

### > 社会学对话

跟着卡尔·波兰尼一起在全球资本主义下求生存：  
Robert Kuttner 专访  
Johanna Grubner, 澳洲 5

### > 气候与变迁

南亚的气候移民  
Md. Rezwan Siddiqui, 孟加拉 8  
气候危机与对民主的质疑  
Markus Wissen, 德国 10  
资本主义的下一步：民主生态社会主义？  
Vishwas Satgar, 南非 12  
都市的气候行动如何重建社区  
Joan Fitzgerald, 美国 14

### > COVID-19: 大流行与危机

行善背后的阶级与污名：印度的封城  
Mahmudul Hasan Laskar, 印度 16  
照护的稀少性？照护移民与政治人口学  
Attila Meleg, 匈牙利 18  
COVID-19能终结全球化现象吗？  
Iliana Olivié 与 Manuel Gracia, 西班牙 20  
面对COVID-19：中欧的居家照护  
Brigitte Aulenbacher, 奥地利；Petra Ezzeddine, 捷克  
Dóra Gábel, 匈牙利；Michael Leiblfinger, 奥地利；  
Kinga Milankovics, 匈牙利；Veronika Prieler, 奥地利 23  
南亚封锁期间的公共社会学  
Dev Nath Pathak, 印度 25  
直面疫情的公共社会学  
Michele Grigolo 与 Craig Lundy, 英国 27

### > 理论观点

社交隔离：社会学的视角  
Syed Farid Alatas, 新加坡 29

### > 悼念

Yogendra Singh：现代印度社会学的先驱  
Mir Suheel Rasool, 印度 32

### > 重新想像社会

论重新整合基进观点的急迫性  
S.A. Hamed Hosseini, 澳大利亚 34  
「Koyaanisqatsi」之后：文明的再想像  
Barry Gills, 芬兰 36  
拉斯塔法里运动及西印度的再发明  
Scott Timcke 与 Shelene Gomes, 千里达及托巴哥 38

### > 斯里兰卡的社会学

全球和在地脉络下的斯里兰卡社会学  
Siri Hettige, 斯里兰卡 40  
斯里兰卡社会学—回顾既往  
Subhangi M.K. Herath, 斯里兰卡 42  
反思和平、冲突及暴力  
Kalinga Tudor Silva, 斯里兰卡 44  
暴力分析：斯里兰卡的国家构成  
Farzana Haniffa, 斯里兰卡 46  
微微之界：  
斯里兰卡的社会学与人类学  
Premakumara de Silva, 斯里兰卡 48

### > 议题开讲

全球化与依赖性：  
中国塑胶废弃物议题  
Pinar Temocin, 日本 50

「2020年代被认为是人类史上最至关重要的世纪中最关键的十年，其中『寻求不可能』成为新兴革命力量的唯一『现实』选择。」

S.A. Hamed Hosseini

# > 跟着卡尔·波兰尼 一起在全球资本主义下 求生存： Robert Kuttner 专访



Robert Kuttner 是《美国展望》杂志的共同创办人与编辑，以及布兰代斯大学海勒社会政策与管理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创始人之一，现任职于该研究所的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Kuttner 一共出版了12本书，例如最近的《民主能否倖免于全球资本主义？》和谈及民主与2020年大选的《存亡之际(The Stakes:

Robert Kuttner 来源: Robert Kuttner

2020 and the Survival of American Democracy)》，其他著作还有2008年的纽约时报畅销书《奥巴马的挑战：美国经济危机与改革总统的权力》、2013年关于金融危机的著作《债务人的监狱：经济紧缩与机器的政治》等；其中《一切皆可卖：市场机制的优势与局限》(1997)是他最为著名的早期著作。他的文章曾刊于《纽约时报书评》、《大西洋》、《哈泼杂志》、《新共和周刊》、《纽约书评》、《纽约人》、《纽约杂志》、《琼斯妈妈》、《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公益(Commonweal)》、《异议杂志(Dissent)》、《外交》、《新政治家》、《政治科学季刊》、《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哈佛商业评论》和《挑战(Challenge)》等杂志上，主题涵盖经济与政治的互动。此外，Kuttner 也曾担任《华盛顿邮报》的国家撰写人与专栏作家、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调查员、卡特总统的社区国家委员会执行主任、《新共和》的经济学编辑。

他更获得许多奖项，例如因毕生致力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正义议题，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颁发的保罗·霍夫曼奖(Paul Hoffman Award)。此次访谈由Johanna Grubner担任访员，他是奥地利约翰·克卜勒林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也是《全球对话》的助理编辑。

JG:你在2018年发表的著作《民主能否倖免于全球资本主义?》里,你提到了卡尔·波兰尼对二十世纪初的分析,指出我们如今,不管在经济或是政治上,都面临了类似的情境。可以请你为我们的读者解释这个论点,说明波兰尼的观点如何在你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发挥作用吗?

RK:在二十世纪初,财富菁英和其政治盟友,默许资本主义凌驾于其他社会韧性(social resilience)的机制之上。《凡尔赛条约》更是加剧了这样的情况,将自由放任、债权集中的概念和经济紧缩政策结合,导致当时一般大众的生活在经济上变得困难;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地利,大量民众转向了法西斯主义。他们会这么做,除了是对议会制度失去了信心,也是因为极端的经济型态和政治民族主义似乎能带来更好的出路。

在波兰尼的描述里,十九世纪经济体系由三个机制构成:黄金本位、自由贸易,以及劳动力必须以商品形式在市场上产生价值的观点。这和现在的情况如出一辙:黄金本位中的预算平衡与紧缩政策、世界贸易组织和新自由主义,使不受监管的全球商业扩张加剧、对劳工的保障也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消灭殆尽。自由放任的政策再次为民众招来经济灾难,其在政治上的反弹力量,更形成极端民族主义。

更恐怖的是,我们可以从战后的这段时期知道,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社会保障机制可以让资本主义的体系更具生产力、更加公正,并借此缓解纯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自1973年以来,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平衡在政治上是难以维持的。资本家不喜欢、并抗拒这些约束。

这样做的后果,在1920及1930年代也是一样的。劳工受到不合理的对待时,政治中心并没有站在他们那边,而是转向了极右派。在1990年代,许多人变得倾向左派,但是1990年代倾向左派的人,也已经接收了大部分的新自由主义价值。

如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由一位新法西斯主义者所领导;旧欧洲、新欧洲都有新法西斯主义者,能被信赖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已很稀少。前面说的这些,都非常的波兰尼。

JG:虽然您提到了这几个比较明显的相似之处,但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capitalist production)与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有所不同,例如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是以「即时生产制」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为建立基础的;

这难道不会导致不同的后果吗?波兰尼的分析为何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那么有效呢?

RK:现代经济往全球供应链模式转向,使得波兰尼的观点比起过去的任何时刻都更重要。由于在亚洲受到剥削的劳工薪资较低,大型企业开始把业务外包到亚洲,也连带让民主制度中的社会契约难以维系、劳工在面对变化无常的市场时不受保护。全球供应链现在就像是打了类固醇的自由市场。

JG:在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正在崛起。你会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政府管制的削弱,以及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等地的右翼民粹主义和你之前提及的新法西斯主义崛起之间的关系?

RK: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身。在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体系之下,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要给予国家足够的政治、政策空间,来创造完全就业的经济,并以此保护其不受全球私有资本的通货紧缩威胁。然而,自世界贸易组织创立、欧洲的马斯垂克条约实施以来,全球化却明显变成是利用商品、服务、资本的自由流动法则,来削弱民主政治约束与缓解资本的能力;在欧洲,这样的情况则是透过人的自由流动发生。也因此,受到错误对待的人民只好转向极端国族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玻利维亚的人民则转向了左翼民粹主义。

JG:过去反抗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运动,都会希望能从国际层次出发,来进行相关论述;然而现在的社会运动,多以国家层次来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你觉得这样的社会运动,有怎样的发展空间,和前述的议题又有何关联?民族国家策略带来的优势,对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会是最好的选择吗?

RK:就像我说的,民族国家是政体与民主公民的核心。然而,从布列敦森林体系、国际劳工组织条约中,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公民与劳工的团结扮演着制衡国际资本的重要角色。问题是,布列敦森林体系时期只是个例外。大部分情况下,国际主义已经变成了资本的国际主义,而不是公民的国际主义。

JG:在你的著作里面,你提到了「混合经济体」如何为战后的美国和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可以请你为我们解释一下何谓「混合经济」,这和民主与国家的自治权又有什么关联?

RK:经济学家Paul Samuelson以混合经济一词指称某种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会视情况以福利国家、公共计划、财产共有等制度为辅助,有时还会针

>>

对经济部门和其他产业进行严格的管制。混合经济也会透过管制农业、赋予工会权力使其成为合法的社会夥伴(social partner)，或是透过其他的政府功能，来限缩纯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由于公民权是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形成，这些政策大部分也是以国家为执行单位。简单来说，欧洲各国组成欧盟导致对资本主义的管控逐渐减弱，甚至加强了资本的力量。海耶克早已预示了这样的情况，也乐于见到此种情景。对波兰尼来说，不管在经济还是政治上，混合经济都不是最好的解方。真正有效的，是民主社会主义。

JG:「独立国家里的民主社会主义，要如何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生存并作出反抗？」许多国家的左派仍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对于此种困境，波兰尼有什么见解吗？

RK:这需要透过大国的左翼政府，或是针对全球金融力量进行限制才能解决。虽然备受波兰尼推崇的红色维也纳不过维持了十五年左右，就被更强大的势力摧毁；但至少在二战后的这二三十年间，我们经历了一些类似于社会民主的事物，即便那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在瑞典，这样的状态甚至持续得更久。所以说如果公民成功地被动员起来，这个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至少可以维持一到两个世代。就像凯因斯说的：长远来看，我们都已经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不过，如果全球化体系这么排斥国家内部的社会民主，那就连瑞典或是丹麦如此完善的共识体系都可能面临风险。在全球化主义之下，社会福利和合宜的工资反而被认为不具竞争力，国内的管制也受到消减。作为欧洲大陆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代表，欧洲法院更是指出斯堪地那维亚的社会契约在许多层面与欧盟的基本法不兼容。自从新自由主义者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掌握了权力，他们就开始蓄意地从制度上破坏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由此来看，我们不仅需要修正全球化体系，也要一步步地重建各国的国内政治，两者缺一不可。

JG:你提到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下，强大的国家经济会是维持民主制度的一个有利因素。对你来说，在加强政府权力，以及以公民权为名义维系的全球不平等这两件事之间的协调上，有什么是必要的？

RK:我认为一个公平的经济形式一定要由国家主导，因为民主制度中的公民权利也是由国家而生的。然而富裕国家的公民消耗了世界上极大比例的资源，他们必须为保护环境永续与全球经济公平性出一份力。放任虽然是一种平衡全球收入的方式，却也造成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不平等，间接

导致了民主的衰弱，对于气候灾害的问题更是束手无策。就如Nicholas Stern认为的，全球气候变迁是历史上最庞大的市场崩坏案例。我们应该借由限制，而不是开放自由放任的政策，来达成气候正义与全球平等。

JG:在这个受移民与逃难影响甚深的时代，「公民身分的概念必然伴随着不平等」的论述是饱受争议的。你会如何评论这种应该将民主权利与公民权脱钩的观点？

RK: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有关成员身份的议题。民主政体的成员被称作公民。即使是不具有投票权的「非公民」，足够完善的民主也应当赋予他们基本权利。这些非公民却被当成是外来者——而没有人应该被排除在基本人权之外。这便是那些人权基本条约和公约被建立的目的。像是斯堪地那维亚这类相对健全的民主国家，通常也倾向支持不具有国家公民身份的人，使其享有普世价值下的基本权利。

不过，这些基本条约与公约的实际效用，仍需以签署国家的接受与执行为前提。1951年，由145个国家签署批准的《难民公约(Convention on Refugees)》，就规定各国必须庇护那些有明确受迫害可能的难民。这项公约也赋予难民诉诸法庭的权利。然而，由于对于逃难者与移民的敌视，国家无视了公约的内涵与规范，擅自将经济难民和政治难民作出区隔，使得寻求庇护的人们陷入困境。同样的规避手段，也会在各国内面对国际劳工组织订定的条约时被使用。

JG:COVID-19的疫情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似乎在许多国家成为了一种持续性的危机。在你的观点中，这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又带来了什么危机？

RK:疫情反映出我们急需有效的治理，也显示私有市场在处理公共卫生议题上的弱势。疫苗和检测制度都是社会产品。由有效政府领导的国家，通过和世界卫生组织与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在控制病毒扩散上也做得较好。必须注意的是，这些行动是以政府为主导者。川普如果是个尽职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就应该作为一位有野心的独裁者，展现其处事效力。事实证明，川普既无能又腐败，也显示了政府不能只是强大，更要展现其高效性，以及为民主负责的心态。■

來信寄至:  
Robert Kuttner <[kuttner@prospect.org](mailto:kuttner@prospect.org)>

# > 南亚的气候移民

Md. Rezwan Siddiqui · 东西大学 · 孟加拉



在蒙古,一种被称为「dzud」的气候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种现象描述的是极端的冬季。特别是在与非常干燥的夏季相结合的情况下,它会导致大量的牲畜死亡,而这些牲畜是人口赖以生存的。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flickr.com。保留部分权利。

**南**亚(由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巴基斯坦、尼泊尔、马尔地夫、印度和斯里兰卡组成),估计人口为18亿3600万人(几乎佔了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人类发展指数不断提升以及快速地都市化之下,南亚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前线。

移民一直是南亚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而经济成长的不平衡无疑是促使南亚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但是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在许多关于史前人类活动的讨论中,已经有证据显示人们倾向于暂时性/季节性/永久性地迁移,以减少自然灾害和农业危机带来的风险。在南亚,人口流动行为的主要类型是内部迁移(主要是由农村到城市)。国际上的人口流动也很常见,尤其是在这近几十年中,该地区每年的移民外流(主要是经济/劳工移民)都在大幅增长。由于南亚的国家之间共享悠久的历史、相似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生活方式,加上边界的松懈管制,导致南亚国家之间的人口跨国流动现象也相当频繁。

实际上,南亚在气候变迁上的脆弱性大多不是因生物物理脆弱性(biophysical vulnerability),如气候参数的变化和由此而生的极端天气所引起;而是由社会经济脆弱性

(socio-economic vulnerability)所引起,这包含了社会中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高贫穷率、对农业的高度依赖、基础设施不足、治理薄弱等。根据《2020年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全球报告》(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20),2019年在南亚约有950万人因自然灾害(如:洪水、季风雨和气旋)而流离失所。目前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气候变迁加剧了这些危害的强度、频率和影响程度。根据世界银行指出,视这一问题的解决程度而定,在2050年前可能还会多出1800万到4000万位气候移民。

南亚气候变迁的迁移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首先,虽然气候变迁不是影响南亚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但与其他社会经济脆弱性相互作用后会大大加剧迁移的风险。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经济景气在气候变迁扰乱社会和生计安全之下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气候变迁已直接影响了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粮食安全、人类健康,还有南亚的农业能力和生计。

其次,我们需要了解,南亚的大多数内部迁移都是基于经济因素。相对之下,大部分跨国和国际迁移都是政治和经济因素混合下的结果。不论是透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气候变迁正加剧了这些因素的影响。

>>



在亚洲，台风的发生非常频繁，对人们的生存带来许多威胁。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flickr.com。保留部分权利。

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气候移民与其他种类的移民区分开来并不容易，就算尽了一切努力，却仍是徒劳无功！南亚各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人口流动行为，不论个人或是社区都会采取这些行动，尽可能地减少气候变迁（和其他威胁）对其生活及生计造成影响。而这样多样化的人口流动行为，我们实在无法将它们全部整合到同一个框架中。因此，建立一个与经济、政治移民相联结的气候移民框架，并研究气候变迁对（任何）人口流动行为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可能更有用。

第四，有关气候变迁与移民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数据在南亚难以取得，无可避免地使当局无力制订相关策略和管理移民。此外，气候变迁与其他移民因素（政治、经济或社会）之间，特别是在微观尺度上的作用关系都仍尚未了解清楚。

第五，在南亚，气候变迁是造成内部迁移的显着因素。这种迁移通常一开始是暂时或季节性的人口流动，但随后就变成了永久迁移。在这之中，移民大多会前往都会地区，且遵循移民网路和逐步迁徙（step-migration）的模式。

第六，跨国气候迁移已是该地区的争议性问题。这些国家、政府对于问题的性质、模式和未来上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在议题进一步复杂化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已成为该地区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也同时变成了在安全上被过度炒作的关注重点。

第七，该地区的国家是许多已开发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而其大部分是通过双边

协议（bilateral agreements）来进行管理。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在这一劳动力产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有时，这些劳务迁移会被吹捧为气候移民的适应过程之一，但事实几乎并非如此。

第八，人口流动（或不流动）选择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者的能力以及他们移民的社会。就目前的观察而言，社会中（特别是城市）对于收容气候移民的能力并没有明显提升，环境移民或气候移民仍被迫在社会边缘中生存。

第九，南亚国家的移民政策体制主要在阻止由气候变迁引起的人口流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管理都会地区本已受到限缩的资源和服务。当局并不会花太多精力去提升这些移民者的个人能力、帮助他们适应移民的过程。最近，印度和孟加拉国已采取行动，将次级城市发展为移民友善的地方。然而，这些措施由于无法解决社会正义的问题，以及缺乏以人为本的发展计划，常常被认为是无用的政策。此外，传统的精英利益垄断和普遍的腐败也阻碍着这些计划取得成功。

不幸的是，在这些问题的管理上，南亚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合作成果。付出的努力大多侷限于学术和研究领域，并未反映在发展计划中；而以全面的全国人口普查解决资料稀少的行动也不够充分。如果没有花费心力去理解气候移民的身份、透过国家及区域政策解决事情，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希望。■

來信寄至：  
Md. Rezwan Siddiqui <[rezsaid@ewubd.edu](mailto:rezsaid@ewubd.edu)>

# > 气候危机 与对民主的质疑

Markus Wissen, 柏林经济与法律应用科学大学, 德国

如果我们思考气候危机、气候政策和自由民主等议题, 首先要提到的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紧张局势: 在自由民主的条件下, 就算是以有效的气候政策应对气候危机, 似乎也非常困难。近几十年来, 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已就一些国际条约达成共识, 但这些政策和条约, 却带来许多负面影响。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对于抑制全球碳排放量上升并没有帮助; 而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中, 许多缔约方无法明快地给予承诺、保证会付出更多努力, 这些都让人难以相信未来还会有更有效的气候政策。此外, 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像中国一样的独裁国家, 虽然存在着持续性的环境问题、高碳排放强度的发展模式, 但又似乎能够执行重要的环境和再生能源计划; 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 自由民主制度是否可以应对人类最紧迫的问题?

## > 自由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 结构上的亲近关系

在气候危机、气候政策和自由民主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历史与经验上的紧张关系, 其根源是个更为系统性的问题。民主的实质是平等, 自由民主制度则为公民在政治意义上的平等提供基础: 选举中, 工人的一票与执行长的一票等值; 而执行长作为合法公民, 与工人相比没有任何特权。这毫无疑问地是一项历史性成就。

但这只是事实的其中一面, 由另一面来看, 自由民主制度性地将社会权力中心与平等参与的机会区隔开来。企业家的决定属于个人, 只有他们决定之下的框架条件才会受到公共影响。除此之外的利益相关者, 即受决策后果影响的所有人: 工人、工厂附近的社区、广大公众, 都没有机会去平等地参与决策过程。

在这一点, 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结构亲和力(structural affinity)变得非常明显。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维护了公民、政治权

利, 以及私有财产; 也保证了政治领域的平等, 同时对于基础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又是保持中立。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只有少数人能掌握生产手段, 而大多数人只能出售他们的劳动力。

经济外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已是长期的抗争。过去, 这些抗争导致了全球北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几次扩张: 女性成功争取到了选举权, 也在国家中担任社会再生产的有力角色; 环境运动也已成功限制有毒产品的生产, 及可能对环境有害的工业生产流程; 移民为了扩大公民权而抗争; 工人运动的抗争结果形成了阶级妥协的情况, 而阶级妥协基本上包含了工人接受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底层角色, 以换取资本主义下所促成的财富增加。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立场: 自由民主主义向福利国家的方向扩展, 并不挑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构成性不平等, 但也有助于调节其矛盾。

## > 碳民主

从环境的角度来看, 社会性增强的自由民主一直都是种碳民主(Timothy Mitchell)。而这个问题有两种涵义: 首先, 在二十世纪中制度化的社会权利, 并非工人在采矿业和采矿相关的基础运输设施中奋斗的唯一结果; 也就是说, 其虽然造成了环境破坏, 但对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来说却是必不可少, 也因此工人被摆布于重要的结构力量之上。其次, 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制度设计方式, 取决于碳密集型经济的增长。

这是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形式的自由民主制与基础环境的矛盾: 在限缩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和调节基础社会矛盾上, 必然会产生社会生态成本, 而现在这些成本将导致生存危机。如果无法认知到在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条件下, 应对气候危机的系统性限制, 不管是再有效的气候政策也注定会失败。

# 「在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条件下，应对气候危机的系统的效果有限。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点，气候政策就注定失败。」

就算认知到前面这一点，也并不表示必须回到独裁体制的解决方案。尽管独裁体制可能意味着短期间内，某些环境措施的可执行性和加速性，但它们仍然缺乏长期成功所需的反身性。

## > 基进民主

反身性以审议为前提，而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进行审议。因此，应对气候危机需要的是更多的民主，而自由民主必须超越其固有的局限性。自由民主目前所达到的成就受到右翼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 right)的强烈攻击，必须将其转变为基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来解决现况，这意味着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都有权利平等地参与决策过程；而反身性决策的可能性也将因此增加，因为做出决策的人同样也是承担决策后果的人。此外，基进民主也意味着建立一种积极制裁团结形式行为的制度和程序，从而促进民主学习和主体化的过程，这有助于克服效用最大化下的资本主义主体性。

我们可以将所谓的基础经济(foundational economy)或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主义(infrastructure socialism)，作为思考基进民主的切入点，从对社会和环境有益的生产及服务角度，重新思考并引导经济。这包括：我们所有人所仰赖的照护工作，以及维系生活所需要的健康、食品、交通、文化、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将基础建设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的例子有不少——这样的模式在近几十年来受到新自由主义攻击，在许多地方又因新冠肺炎的疫情而复甦；劳动性别分工的问题也应受到同等关注。此外，我们也应将基进民主扩展到其他仍由大型企业主导的领域，但必须在民主的掌控之下，以防止气候危机加剧。■

來信寄至：

Markus Wissen <[markus.wissen@hwr-berlin.de](mailto:markus.wissen@hwr-berlin.de)>

# > 资本主义的下一步： 民主生态社会主义？

Vishwas Satgar, 金山大学, 南非, ISA 经济与社会(RC02)、劳动运动(RC44)部门研究委员会会员



2019年11月29日周五,示威活动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外面举行。  
来源: Vishwas Satgar。

在当代资本主义以碳为中心的生活世界中,耗油量大的汽车、高科技飞机、大型货柜船和耗能的摩天大楼都是大型的毁灭武器。这些资源密集和以碳为中心的社会关系越是盛行,气候变迁的速度就越快。在地球生态系统破碎之后,这种新的资本主义性质——在父权体制的驯化及科学的观察和管理下——现在必须进行地球工程的处理,将所排放的碳储存在地球的深处。尽管这会对地球上的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但只有从这致命资源中榨出最后一块钱后,榨油的油栓才会关上。当代资本主义的逻辑不仅关乎到掠夺,也与生态谋杀(ecocide)相关。生态谋杀简单来说,就是消除掉维持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生命所需的条件。而这就是Karl Marx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 of capitalism),以及Rosa Luxemburg所说的「对自然经济的驾驭」(conquest of the natural economy)。

## > 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站

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已经在它历史的最後一站得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已经在它历史的最后一站得到了证实。财产权孵化出了资本主权;贪婪的富豪们以最简陋的手段施行了国家权力;而透过美国化消费和民粹主义的媒介而增值的超个人主义则证实了名人文化的平庸。美国化和虚无主义中资本主义主体的自决,是当代新自由主义

与资本主义文明中人性的唯一体现。但是这还不够,下一步是超人类(trans-human):生物资本和数位资本的技术乌托邦视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结构性不平等之后,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世界不再与人类有共同的根底。在没有敌人出现的情况下,这一点更加清楚:苏联的社会主义已死、工人阶级无产化、大自然被征服、历史已经终结。这里无法将事情的矛头指向任一方,但是这个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新右翼、新法西斯主义的后裔——从华盛顿、巴西利亚、新德里、布达佩斯到莫斯科——随时可以残酷地粉碎任何对这个乌托邦发起挑战的事物,同时误导公众于这些代罪羔羊——移民、黑人、「穆斯林」、原住民,或夸大任何「恐怖主义的威胁」。

这些政权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资本主义作为常态,因而时常倾向动用专制和军事化的暴力。然而,历史和抗争都证明了专制政权是多么不堪一击,垄断暴力的方法不能永远保证和平。甚至连美国军方都知道,连他们自身都遭受到气候冲击时,是无法控制这个气候混乱的世界。尽管气候变迁带给这个社会许多艰困的抉择,但另一方面,战争仍需要稀少且代价昂贵的资源,核武器时代的军国主义同样也有所制约。如今残酷的不平等霸权统治已经结束,然而示威者却是既不安又绝望,因为COVID-19增加了他们的痛苦。而同时,民主的主体具有全景的眼界以及多样的数位资源,可以轻易获取有关社会生态的资讯。这样

>>

的主体甚至可以从远处惊叹帝国权力的愚昧、观察独裁者的笨拙，并瞥见激舞人心的底层在街道上主张自我的意见。换句话说，尽管资本主义选择利用新法西斯主义，甚至武器化数位领域，那道完全压迫人民的铁幕也并非无懈可击，民主和社会主义仍将在这个十字路口蓬勃发展。

### > 生态谋杀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步

在当前历史上真正的恐怖不是资本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下的生态谋杀，这不仅威胁着地球上的生存条件，也威胁着资本主义本身。这使得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次降临有时间错置的感觉。尽管气候科学已经发出了警告，关于COVID-19期间碳需求的下降，以及地球上每周都至少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气候冲击；但看到碳资本仍持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扩大其地位，也还真是令人不寒而栗。Trump已经允准美国能有更多的碳提取量，并将其置于供应上的首位；而Bolsonaro则是支持种种商业利益，包括：持续对原住民施行种族灭绝的暴力行为；破坏生物多样性；加上拨款实行刀耕火种的农作方式，使亚马逊快速释放出约1400亿吨的碳排放量。此外，南非的碳统治阶级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发电厂。他们夸耀当地水力压裂的采油技术，并垂涎三尺于离岸天然气和石油的开发前景。这些关于碳犯罪的例子证实，即使在末日时钟的敲打下，资本主义及其碳统治阶级仍威胁着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事物。

显然地，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破坏，其自我毁灭的逻辑现在是非常清楚了。自从柏林会议以来，非洲一直是全球北方的帝国课题，使得流氓资产阶级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由于气候冲击非洲已经部分瓦解了。据估计，至少有2亿非洲人会因持续加剧的气候冲击而流离失所。「欧洲要塞」和「美国监狱设施」将无法将「野蛮人」拒之门外，因为这些社会尽管富裕，但受到气候冲击的影响，他们也将面临严重的内部潜在问题。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灭绝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和气候大罢课(#FridaysForFuture)仅为地球气温上升摄氏1度时所发起的运动。而在气温上升1.5度之时，随着人们拒绝被非理性、生态法西斯的统治阶级视为附带损害，在这些不同的社会中将会有更多人发起响应。

### > 走向民主生态社会主义

以下有三种气候正义的模式，传达了许多人生存的希望，而这样的冀望正被世界看见。这些

充满生存希望的表达方式，正使儿童及公民们与气候正义的力量聚集在一起。首先是对于常态的象征性阻挠，最好的例子是Greta Thunberg和气候大罢课中孩童的抗议行动。孩子们发出的警告正彰显了气候科学的紧迫性，对孩子来说也正是如此。其次是使他们陷入碳的僵局，包括以化石燃料提取电路等，巧妙地进行阻挠。像是呼吁抵制麦当劳、Walmart和Subway，因为他们跟亚马逊的刀耕火种农业有利益上的关系；或是像Ende Gelände的公民运动，其致力于占领德国的煤矿场。第三是通过诸如绿色新政等系统性替代方法，对生态谋杀的资本主义进行战略性的阻挠。这些替代性方法促进了快速减碳、去军事化、民主体制改革，从而使人们有能力去推动公正转型，以及气候正义的地缘政治。就像是Bernie Sanders的《GND》和南非的《气候正义宪章》(Climate Justice Charter)等，以政治计划为概念的例子。最终，这些力量将扛下对抗帝国主义生态谋杀逻辑的重担，以确保安球南方能够做出自己对气候正义的选择，包括进行深度的系统性改革，从而推进民主生态社会主义。

至关重要的民主体制改革必须从外围进一步全球化，透过粮食主权和生态农业达到对世界的「重新农业化」(re-agrarianization)。这是由La Via Campesina于20年前所倡议，地球上的每个社区、村庄、城镇都必须采用这种民主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最近的生物多样性报告，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土地使用报告都强调了这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单一产业、碳中心和全球化的粮食系统都与我们的灭绝息息相关。

最终，当代社会主义的生态视野将由生物灾害(例如：COVID-19)、全球暖化、气候冲击、不平等加剧，以及人类对生活的动力来定义。水、土地、生物多样性、海洋和生物圈等等全球共有地，都将卷入大自然对资本主义生态谋杀的报复之中。自然的无限和人类的有限，将定义社会生态历史的下一个时期。正是在这一交汇处，民主生态社会主义将能更深入地学习地球生而俱来的传统，以改善生活、拒绝生产主义，并重新确认与自然疏远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积极人本主义」(positive humanism)。在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周期内运转的缓慢世界，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样的世界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被殖民、新自由主义和帝国暴力所笼罩住。■

来信寄至：

Vishwas Satgar <[Vishwas.Satgar@wits.ac.za](mailto:Vishwas.Satgar@wits.ac.za)>

# > 都市的气候行动 如何重建社区

Joan Fitzgerald, 东北大学, 美国



2016年6月, 玛格丽特·戈登女士于西奥克兰环境指标项目的某次集会。  
摄影: Brooke Anderson, 来源: 西奥克兰环境指标计划。

COVID-19的疫情揭开了这座城市的两种不同样貌。第一种是这座城市当前种族和族群不平等的真实样貌。在美国和欧洲城市, 低收入地区和有色人种社区的COVID-19死亡率较高。由于他们生活在污染较严重的社区, 美国的黑人和拉丁裔族群更容易患上哮喘病和其他相关的疾病, 也因此使他们面对病毒时更加脆弱。此外, 他们也因为从事着低收入工作, 使他们更容易接触到病毒; 而拥挤的住房环境意味着他们无法在家里保持防疫距离; 另一方面, 他们的社区也经常缺乏公园、杂货店等基本的便利设施。

但是这场危机也揭示了一个契机: 一个绿色、平等的复甦机会, 将气候行动与种族、经济正义相结合。向我们位于第一线的社区(即那些最快遭受气候变化影响, 影响也最严重的社区), 推广这一愿景是当务之急。大多数城市的气候行动计划不是绝口不提公平两字, 就是只会纸上谈兵; 然而, 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 有越来越多的

团体正在对市政府施压, 要求政府将关注点置于气候正义的议题。

## > 民主的计划

计划是企业的核心。有太多的城市, 尤其是美国, 计划是由私人开发商和商业参与者推动。若需要一个民主的结果, 需要的是更加民主的计划。

奥斯汀、马德里、西雅图、奥克兰、波特兰, 普罗维登斯和维也纳等城市, 在经过缜密的思考后最近更新了针对气候的行动及综合计划, 使第一线社区的居民也能参与其中。在最好的情况下, 居民团体与市政官员都能一同制定目标, 从司法角度分析, 并共同参与执行的阶段。

这些计划有助于第一线的社区建立社会、环境和经济永续性。即将实施的《普罗维登斯气候正义计划》(Providence Climate Justice

>>

Plan)的首批内容之一,就是建立两个优先采取计划的绿色正义区:奥尔尼维尔和南普罗维登斯。这些区域的潜在计划项目包括:在关键设施中建造微电网,以利断电时能维持电力;节能化(weatherization);开发可再生能源;职业培训;还有分区改革,以防止污染土地受到使用。

## > 绿色正义

绿色正义区将气候与社会正义的目标结合在一起。这个想法是将气候和社会正义议题的各个层面结合在一起进行整合,使居民能够参与社区建设。这个计划的项目可能包含:可再生能源、房屋的大规模翻新、创造社区空间、创造就业机会、新建净零耗能(zero-net-energy)学校、新建或改建公园、建立完整街道、建设绿色屋顶,以及种植更多树木以解决都市的热岛效应和雨水的管理问题。

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也将执行的重点放在最贫困的社区,并在2020年7月发布的《2030年公平气候行动计划》(2030 Equitable Climate Action Plan)中加强了这个部分。该计划的《种族平等影响评估与实施指南》(Racial Equity Impact Assessment & Implementation Guide)提供了识别第一线社区的标准,以及如何与居民和社区组织共同合作、监测公平结果的策略。

在这个计划之前,西奥克兰已经被指定为奥克兰的其中一个第一线社区。西奥克兰有着三条高速公路、港口、污水处理厂和航空燃料驱动的尖载电厂,这些公共建设都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提高了人们哮喘、中风和郁血性心衰竭的发生率,也缩短了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因此这个计划优先考虑于,对建筑物高度减碳以及燃料转换——用电力装置代替天然气炉具、空间、热水器。

燃料转换可改善室内的空气品质及减少气体排放量。如果全面实施,可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18%。此外,如果提高建筑能源效率,将进一步减少12%的排放量,并有助于减少家庭的能源负担——根据一份有明显差距的数据中指出:低收入家庭在电力和天然气等公用设施上的支出,在家庭收入上所估的比例比一般的家庭更高。

## > 公民科学

西奥克兰市之所以能达到成效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与长久以来的环境司法团体建立了夥伴关系,这些团体为社区提供了干净的空气,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自2002年以来,《西奥克兰环境指标计划》(West Oakl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Project)一直致力于改善社区的空气品质。联合创始人Margaret Gordon回忆道,她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导引着一辆辆冒出柴油烟雾、在港口与社区之间进进出出的卡车。

自那之后,《指标计划》就持续与环境保护基金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谷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共同合作于公民科学领域,以监控特定地点的空气品质。他们知道该州的空气监测系统并没有发现热点。其中一个计划是让居民站在街角数卡车的数量;而另一方面,他们在老年居民的家中装设空气监测仪,让他们在一天的不同时段中纪录开、关窗户监测仪数据上的不同,以找出污染最严重的时间点。在另一个计划中,居民则是接受了Intel的培训,学习如何从背包中的空气监测仪下载数据。一旦确定了特定的污染源,他们就可以向政府证明当地必须加强污染防治和清理工作。

经过了所有这些努力,空气品质得到改善了吗?Margaret Gordon说,她的窗台曾经是乌漆墨黑,但现在的颜色已经变成深灰色。显然地,我们必须减少更多污染,并在这里采取新的公平气候行动,而这理应成为我们的首要之务。

但是,城市的计划施行得并不完善。能实现精细监控计划的是国家立法和资金,像是2017年通过的《加利福尼亚州议会法案》(California's Assembly Bill (AB) 617)就提供了多方面的资金,支持了以社区为中心的空气质量监测法。但由于疫情使国家和地方政府资金短缺,许多不错的计划都无法实施。也因此,我们必须等待下一个国家行政机构,为绿色新政的提案提供资金。■

來信寄至:  
Joan Fitzgerald <[jo.fitzgerald@neu.edu](mailto:jo.fitzgerald@neu.edu)>

# > 行善背后的 阶级与污名： 印度的封锁

Mahmudul Hasan Laskar，印度梅加拉亚邦科技大学



印度巴佩塔阿萨姆邦的食品分发，2020年4月。  
来源：Sayantan Roy Choudhury。

为了避免COVID-19的盛行，印度政府实行了全国性的封锁。具阶级差异性的隔离措施及封锁造成不同群体大小不一的影响，这些残酷现实已引起关注。由于封锁造成的失业与薪资下降使得贫穷及极端不平等情形更加醒目。其中最严峻的情形是富裕与中上阶级施加在穷人的糟糕作为。自从封锁开始，网络上社群媒体便开始风行一些富人向穷人提供物资的照片，而且这些照片是富人自己发出的。这样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高度公共化的行径又将对于真正意义上的重分配造成什么影响？

## > 回应的匮乏

这些富裕及有钱的中产阶级发送了一定量的物资给穷人度过一或两天的日子。但这些菁英们怎么不了解这样只提供一到两天的餐

点并无法解决问题？这些大资本家明明可以善用社会企业责任(CSR)资金来改善问题，但他们却以投资这笔资金的方式来生产自己的利益。单单靠政府并无法改善贫穷，除非资本家愿意伸出援手，而且确保提供不只把工厂工人当作生产工具的「好工作」。

社群媒体上的照片呈现出富人在自家大宅院前发送纾困物资给列队在庭院的穷苦民众，这让人联想到封建模式中的社会阶级。纾困物资包里主要是半升或一升的食用油、两到三公斤的米和饼干、一到两块肥皂、一到两公斤的洋葱和马铃薯。这些物资到底能不能让人活过超过两个月的封锁期是值得反思的议题。穷苦家庭小孩的教育和健康呢？当富裕人家享有线上学习的科技产品和技术时，他们根本没想过穷苦人家孩子难以获得教育资源的问题。

>>

## > 借由慈善来拉抬自己

因疫情带来的封锁反而成为这些有野心的社会工作工作人员展现他们虚假的领导能力并借此获取政治利益。发放纾困物资给穷人已成为一种地位象征，且这种行为被刻意地展现在社群媒体上。这些假社工刻意地操弄这些给人的印象并牟取自利。在脸书上有许多诡异的照片呈现人们在路边或市场发送食物包。饥饿的展现并不是种骄傲的展现，而是羞辱，但那些富裕的人们将发送食物视为一种奖励仪式。发送食物的行为经由社群媒体被光荣化，彷彿饥饿穷苦的民众将以这些食物包度过余生。举例来说，在阿萨姆邦的Guwahati市有包括摄影师三人向路边的菜贩发放口罩，整个过程被高档的摄影机记录下来。因封城而被困住的移工刹那间成为都市中产阶级和特定群体关心的对象。在疫情导致得封锁前，这些所谓的社会运动者根本不关心穷苦移工，因为他们忙着追社群软体流量。

## > 羞辱与尊严

这些自我中心的富人以穷苦人家的尊严为代价，炫耀自己的慈善形象。这些富人的社会服务只有恶化穷苦人们的境况。穷苦人们为自己的尊严、生命和小孩而焦虑，因为他们的脆弱经由富人的社会服务散播到了社群媒体。他们的贫穷因为荒谬的摄录方式而成为污名。社区中的富人盛典式的发送物资，然而其他人只能无助且带有罪恶感的接受。现在这些穷苦之人将在这些富裕邻居的虚假同情压力下过活。穷苦人家的小孩可能在学校难以建立自信，因为这些富人展演的社福工作毫不掩饰地将他们的贫穷曝露出来。贫穷的表达本身并不羞耻，但将穷苦人以这种社会福利表演当作是乞丐，这是十分羞辱的事情。这是为什么贫穷或弱勢的群体有自我文化和惯习认

同的原因。自尊的减损已经在印度社会发生，因为印度经济中一度能自给且富有活力的农业逐渐走下坡。工业化创造了劳力和雇佣劳动市场，大批原本能自立的农民现在成为城市中的穷苦移工。

## > 真正的解决之道

来自农村的移工议题已经成为假道学和社福工作的关注主题。但对于那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十分不同的，包括回到自立的农业、以保护生计和自然资源的环境主义以及支持在地住民的小规模农业企业。以上这些提案都能为移工和贫穷议题提供真正的解决之道，但不幸的是许多实体或网路的研讨会及社群媒体的文章沦于肤浅的讨论，没有对问题有更多的有效论述。

特定群体在社群媒体上竞争或炫耀物资或食物的发送的照片影响了穷苦民众的尊严。这无法提供长远的解决之道。如果富人是认真想要帮助穷苦民众，他们不应该将财富重分配的举动视为一种地位或傲慢的表演。■

來信寄至：

Mahmudul Hasan Laskar <[rhasanlaskaramu@gmail.com](mailto:rhasanlaskaramu@gmail.com)>

# > 照护的稀少性？

## 照护移民与政治人口学

Attila Melegh, 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 匈牙利

**至** 2010年, 人道关怀已成为全球特定的社会议题。自1980年代以来, 在老龄化、持续的市场化(不重视再分配), 以及农民的消亡三者间出现一个特殊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及历史动态导致照护人员稀缺, 以及相关的照护移民产业急剧增加。这使移民照护工陷入更艰难的处境, 特别在COVID-19疫情的持续下, 获得医疗照护的渠道在全球显得更加重要。全球有很大一部份的人口-不仅是贫穷国家-都日益依赖于以移民劳动力为基础的各式照护系统。同时, 移民工作者也陷入照护工作需求增加、就业状况日趋不稳定、对移民的敌意加剧, 以及受疫情而日渐严密的安全监控等多重问题。现况来看, 提供给病人及长者的照护资源已变得更加竞争且脆弱。

### > 日渐增加的家庭和医疗照护移民

虽然目前仍缺乏针对家庭与健康照护人员的全球系统性数据, 不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 在2015年时, 全球大约有6,710万名家庭照护工, 其中1,150万为移民、近四分之三为女性, 同时, 医疗照护移民也有所增加。世界卫生组织(WHO)2013年的估算显示, 医护人员短缺1,740万人, 并预计相关需求将急剧增加, 只能通过增加移民来解决。在2007至2016年间, 相对富裕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不包括美国), 接受国外培训的护士数量增加至少80%, 医生的数量则至少增加45%。在2016年, 上述国家的国外受训医生人数达到近50万, 护士人数远超过30万。在某些国家, 外国出生的医生比率上升至少10个百分点, 达到整体的40%或50%(在COVID-19疫情期间, 许多医生因当地或该国封境而无法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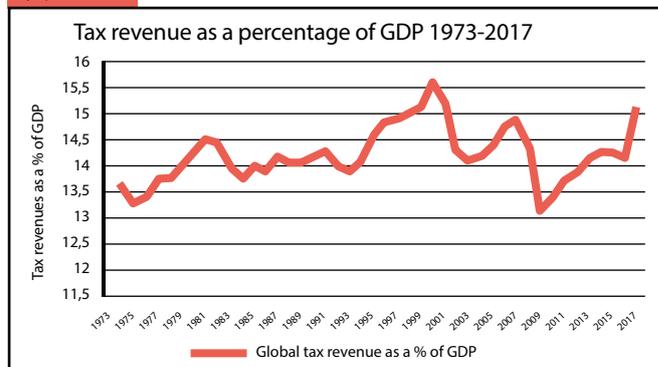
### > 高龄化、医疗费用上升和不变的重分配

人口迅速地高龄化以及对需受抚养长辈的照护, 不论在劳动生产力或实际照护需求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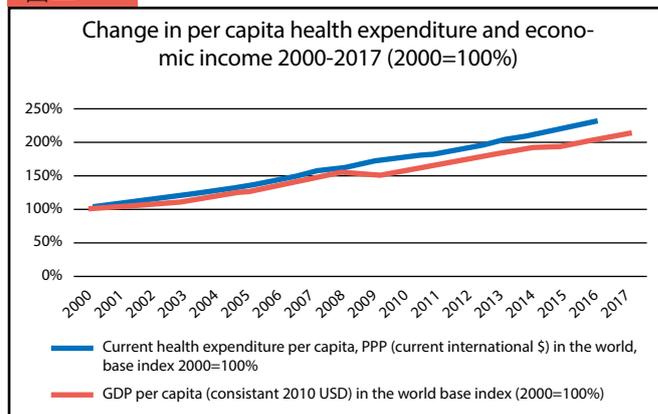
都给年轻一代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在全球的国家重分配持续停滞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正如József Böröcz(2016)在其与工作相关的社会提拨(social contribution)的研究中所见。此外,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国内生产毛额(GDP)中的税收收入分配(再分配率)在全球都出现停滞的现象, 平均约在14%上下。同时, 至少自2000年代以来,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一直以高于人均GDP增长的速度上升(见图1和2); 在世界各地, 受抚养的高龄者也从9.5%增加到13.2%(见图3)。这其中, 包含高龄化的欧洲, 也有人口相对年轻的国家。

直到2010年, 世界人口高龄化的速度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 这意味着, 尽管再分配率稳定, 但可用于公共和私人老年照护费用的资源却不断增加。然而, 从2010年开始, 高龄人口抚

图一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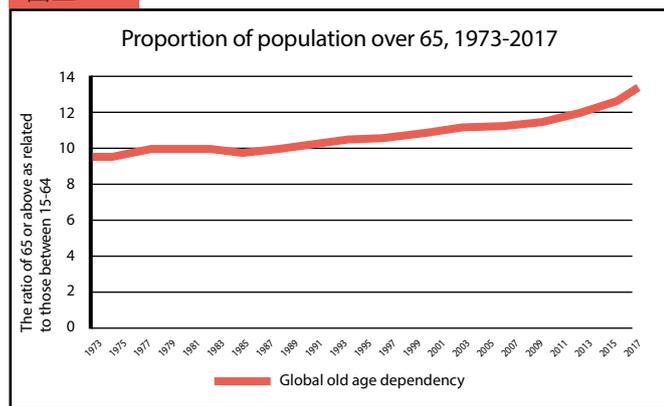
来源: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

养比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成长的速度。这意味着人均健康支出所需的收入可以来自其他的私人资源(依靠人们自己的收入在市场上购买此类服务的比例不断增加),和/或与健康相关的公共支出所占的比例正在增加,牺牲的是其他的公共目标。反过来说,这种重组必然会导致社会和健康产品的市场竞争和福利竞争加剧,使得照护移民工为自己寻求社会保护更加困难。

这一连串的问题可能使迁移在各方面更加复杂。移民可能从其工资和汇回母国的钱中购买福利服务,或是试图借由移入其他国家,以寻求他国福利系统的保障。除此之外,具有完善的福利制度却不友善的移入国家可以同时惩罚移民,并要求他们的社会贡献,以改善税收在高龄化、社会和健康需求,以及公共支出之间的平衡。此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不仅在地方团体间、地方团体与移民之间,而且在移民团体本身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竞争迹象;从对东欧护理人员的访谈中可见得,他们拒绝「昂贵」地保护接踵而来的难民。COVID-19疫情只加剧这些紧张的局势,而我们尚未看到当前经济危机的终结。

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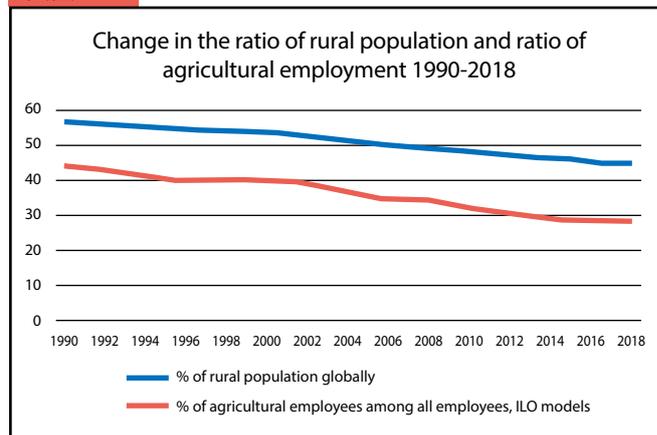
来源: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 全球照护的竞争与国家保护

霍布斯邦在《极端的年代》中提出「农民之死 (death of the peasantry)」后,由于国家重分配和高龄化比率的变化,这种矛盾变得尤为严重。农业就业人口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持续快速地下降,到了2018年,全球已下降到30%以下。与城市人口相比,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农村人口成为少数。与历史上重要的乡村家庭体系相比,由于高龄化所致的照护负担将逐渐地

导向市场和国家重分配体系。这意味着,仰赖家庭照护的老年照护将减少。即使在较贫穷的国家,直接提供家中长者食品和物资的情况已日渐减少,相反的,对于购买国家和市场的健康与社会服务(包括由当地人或移民工所提供的高龄照护)有所需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转变之一,并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决定性时刻(图4)。

图四



来源: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这意味着将加剧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反过来加深对于国家保护的反需求,这是威权民族主义的理想结合。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与照护稀缺相关的矛盾可能是转型的根源。因此,在COVID疫情期间及之后,政治人口的辩论将加剧,普遍的社会保护和经济体系的根本变化将被视为矛盾的市场化的替代方案。而情况也的确是如此。■

来信寄至:

Attila Melegh <[attila.melegh@uni-corvinus.hu](mailto:attila.melegh@uni-corvinus.hu)>

# > COVID-19 能终结全球化现象吗？

Iliana Olivé 及 Manuel Gracia, 埃尔卡诺皇家学院和马德里孔普卢腾斯大学, 西班牙

**当**今的全球化进程,可以回溯到1970年代,当时全球经济经历了成长、紧缩及变异的各个阶段。这些现象可以回应到当时全球经济市场及地缘政治秩序的结构变迁,包含了亚洲几个新兴经济强权的兴起,以及全球活动连带的自大西洋转移至风起云湧的太平洋地区。

发生在2000年代末叶及2010年代前期的经济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大幅改变了全球经济,在Elcano研究院提出的「[全球影响力指标](#)」(the Elcano Global Presence Index)中,反映出这些改变加速并加剧了前述几项结构性变迁连锁效应的趋势。现在面临的卫生、经济、政治及社会危机同时也对国际关系及全球化的进程造成负面影响。

虽说预测全盘局势走向仍言之过早,但我们已经可以窥见这些危机带来的苦果,像是全球产销链的断裂,以及连带停摆的贸易活动。我们也不难预测一些国际人流戏剧性地减少后所带来的效应。

## > 疫情之前:早已走向去全球化的世界

在20世纪的末三十年里,各国大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这使得国际间的经济流动急遽提升。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方浪潮总是伴随着跨国界的人口(协防驻紮军力、移民、观光客、学生、国际赛事的运动员以及国际移工)及思想(资讯、文化、科学、科技与教育的交流),这些不同形式的国际化现象而移动。即使全球化在学院里的定义中常标志出其他非经济取向的概念,对于国际化历程的分析依旧倾向经济的向度。

对经济层面的格外关注须对部分对于全球化现象的预测负起责任。这些预测指出,全球化将走向趋缓、终结,或甚至进入[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大衰退。

而当特定贸易链及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国际化现象的成长趋缓(甚至是在特定年份对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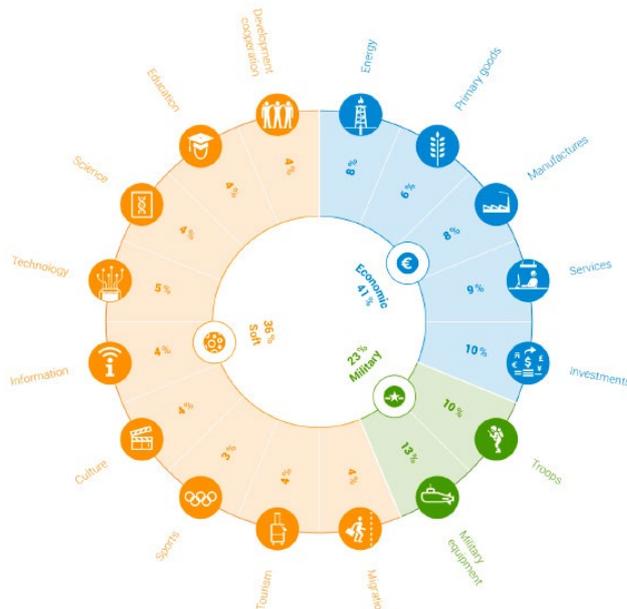
定市场条件的变动),[Elcano全球影响力指标](#)显示,即使国际化转而以更为隐微的形式运作,成长也显著地走向迟缓,全球化现象却并未走向回头路。

涵盖130个国家、充斥各种变量及向度,全球活动的附加价值着实影响着全球物资交流总量,并因而得以作为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指标(图1)。

奠基于这项指标的走向,我们可以检视几个全球化的时期:(a) 1990年到1995年间,与欧洲地缘政治的重组态势相符,全球活动在此阶段得到整合,使年均值减少1.6%。(b) 这属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承接了自1995年到2011年的成果,总计有57%的成长。(c) 后大衰退时期,消长的历程和缓,年均成长约1%。(d) 紧接着来到一个急遽成长的阶段,有超过5%的成长,全球交流活动量因而回到经济危机前的成绩。(e) 近期。30年内最大的年度负成长纪录,现在已短少了2.6%。(图2)。

各个变量及向度(经济、军事与软性交流层次)也在这个阶段以不同的途径影响着全球化的演进速度。在1990年到2005年间,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在于经济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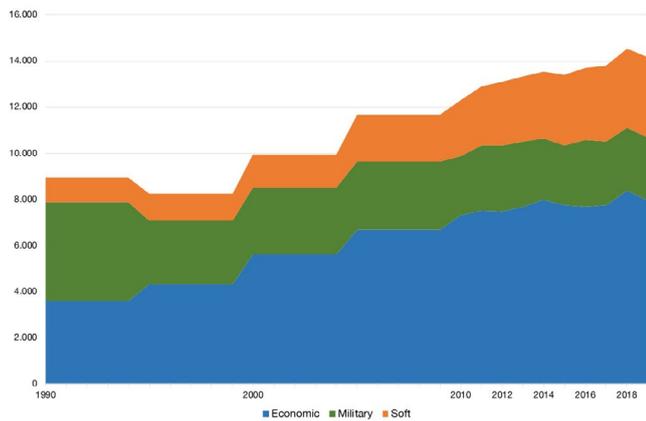
圖一:Elcano全球影响力指标



来源:Elcano皇家研究所,全球影响力指标。

20

圖二：全球影响力提升的價值  
(共130个国家，1990-2019年，以指标值点计)。



來源：Elcano皇家研究所，全球影响力指标。

相较于军事交流为全球化带来特定方面的紧缩，软性交流的层次则提供全球化一个适中而正向的成长助力。

然而，这样的趋势在2000年代得到显著改变，软性交流在此时开始成为领导着全球化现象的力量。至于在晚近几年，全球活动的成长与衰退则主要均因着经济表现而波动。

## > 疫情來臨：COVID-19對全球交換體系的影響

需要強調的是，Elcano全球影響力指標呈現了結構性的趨勢，這代表短期的金融市場動盪及暫時的政治局面變化將不會對其結果造成影響。Elcano全球影響力指標在全球活動的向度與變量有所異動後，有兩年左右的延遲，才能將變易反映在指標中。

2008及09兩年間的金融危機所引發的效應便直到2011年才顯現，而COVID-19的疫情對全球活動帶來的影響也不被預期在2021或2022年前被登錄在數值上。

儘管這次疫情在不同領域帶來的短、中、長程衝擊已經被不同的作者與機構預報與預估過了，但要論及全球化的整體圖像則依舊未完成。其中一個探知這次衛生危機後勢（以及在全球尺度及由各國發展出的政治應對措施）的方法是以基於Elcano全球影響力指標的附加價值之上、經濟大衰敗的後續效應來觀察幾個可能的局勢走向。

## > 局面A：2008年的危機重演

如果現在面臨的衛生緊急事件與其在經濟、政治與社會層面帶來的改變與2008年前次危機相似的話，那麼我們便可以預期Elcano全球影響力指標在各個變量及向度的變化會像是2010到2015年的走勢。

## > 局面B：比2008年更糟的情況

部分论者指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局势变化将会比2008年的危机来的更深远且具毁灭性。那么，在这样的局势里，那个由众多要素组成的指标或许将会自2022年起便在每一个项目里都呈现所有可能的情况中最糟的图像。

## > 局面C：不同于2008年的危机

最后，这次危机中的部分迹象及其与2008年的差异可能代表着这次将不同与前次。预报及预估指出，这次危机在经济要素的影响将与大衰退时相似，而在软性交流的层次则更甚上回，因为疫情带来的是跨境流动的人口（驻军发展、教育、移民与旅客等变量均被影响）戏剧性的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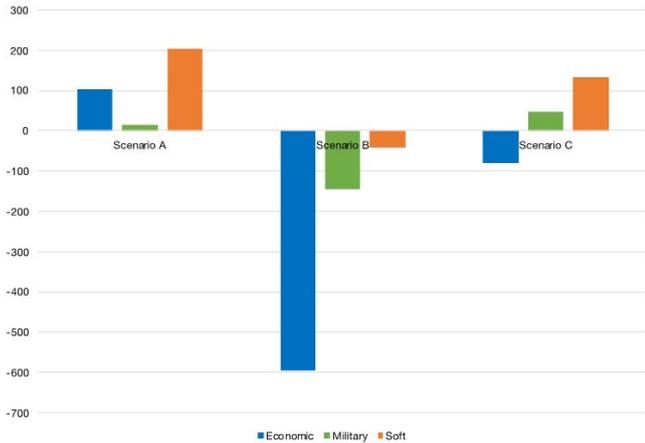
在这个版本的局势走向里，16个变量（基本的推论及原理详见连结）中每一个项目的预期表现都将把结果导向当前危机与2008年危机对全球化冲击不同的局面，即局面C。（图3）

圖三：COVID-19后  
全球化的三种情景(%)

	Scenario A Crisis similar to 2008 Average rate (2010-15)	Scenario B Crisis worse than 2008 Larger reduction (2010-18)	Scenario C Different crisis to 2008
Energy	6.8	-36.2	-11.1
Primary goods	4.3	-7.5	-1.1
Manufactures	2.6	-3.4	-0.7
Services	1.7	-0.7	-0.7
Investments	-0.3	-8.9	-0.3
Troops	-4.0	-10.2	5.7
Military equipment	3.7	-2.0	-1.0
Migration	1.4	-1.0	-1.0
Tourism	3.7	2.0	2.0
Sports	-0.8	-1.7	-1.7
Culture	7.3	-8.9	-1.8
Information	16.9	-1.4	16.9
Technology	4.2	1.7	4.2
Science	5.0	3.4	5.0
Education	5.2	0.1	0.1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2.6	-4.8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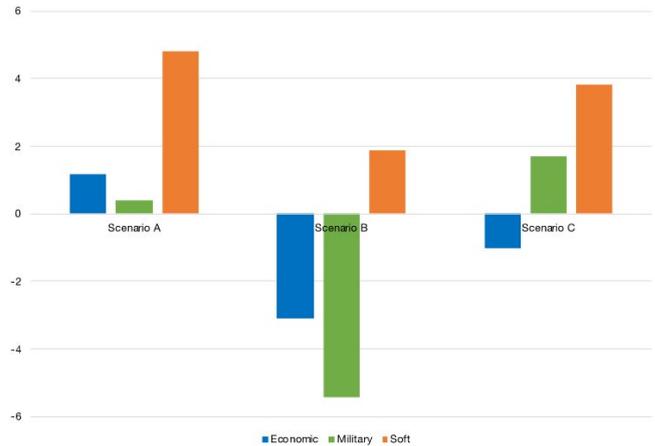
來源：Elcano皇家研究所，Elcano全球影响力指标。

圖四：在A、B和C情景下的预测全球业务总和  
(指数相对于2019年的值变化)



來源：作者，以Elcano全球影响力指标为基础推测。

圖五：在A、B和C情景下的预测全球业务总和  
(该指数相对于2019年的变化百分比)



來源：作者，以Elcano全球影响力指标为基础推测。

在前述的三种局面里，只有局面B将带来强大的去全球化现象，而这背后是来自130个国家在全球活动总量中各从2019年的数值水准降低1%。这将影响到全球化的所有向度，特别是经济面向(这毋庸置疑)及军事面向(相对而言)。

然而，如果这样的转变势态更倾向类似于前次危机(即局面A)，我们可以预期全球化的现象将会持续(全球活动总量增加1.7%)，软性交流的成长将得以累积，而经济面向的全球活动交流成长则居次。

最后，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态势将让我们看到一个近乎停摆的、仅成长0.7%的全球化光景。我们会在这个局面里看到更为活跃的软性交流，却也被陷入微幅缩减的经济交流活动所抵消。(图4及图5)

简言之，当前的危机将在国际关系上造成冲击，结果将类似于2000年代后期的危机。我们可以预期看见结构性变迁的加速进行，而那也正是我们早就可以预见的全球化进程。■

來信寄至：  
Iliana Olivie <[iolivie@rielcano.org](mailto:iolivie@rielcano.org)>  
Manuel Gracia <[mgracia@rielcano.org](mailto:mgracia@rielcano.org)>

# > 面对COVID-19： 中欧的居家照护

**Brigitte Aulenbacher**, 约翰开普勒林兹大学, 奥地利, ISA 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RC02), 贫穷、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委员会(RC19), 工作社会学委员会(RC30)与妇女、性别与社会研究委员会(RC32)成员; **Petra Ezzeddine**, 布拉格查理大学, 捷克; **Dóra Gábor**, 匈牙利人口学研究所; **Michael Leiblfinger**, 约翰开普勒林兹大学, 奥地利, ISA RC19 与 RC30委员会成员; **Kinga Milankovics**, Hekate自觉老龄基金会, 匈牙利; **Veronika Prieler**, 约翰开普勒林兹大学, 奥地利, ISA RC19 与 RC32委员会成员



为通勤者设计的口罩, 这样他们就可以立即被识别为在匈牙利-奥地利边境工作的人。

**在**中欧, 居家照护已经成为高龄照护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支柱。主要为移民女性的照护工作者在照顾需求者家中生活与工作。他们的工作职责从家庭事务到医疗照护。针对居家照护的法规因国家而异, 但不稳定的工作条件是其中的共通点。中欧的居家照护是根据移徙劳工为基础, 中介经常由贫穷国家招募照护工作者, 因此, 这群劳工被迫接受国外的任何工作。这种模式能够运行的先决条件是, 欧盟成员国内的劳工或多或少能够自由流动, 然而, 在疫情期间因边界关闭, 人们不再认为这种模式是理所当然。本文透过介绍奥地利、捷克与匈牙利当前居家照护处境以及各自不同的居家照护模式, 并分析疫情对居家照护的影响。

## > 奥地利、捷克与匈牙利的居家照护

在奥地利, 居家照护在法律上被视为一种专业。一般而言, 两个照护工作者每二至四星期会在一个家庭中轮换一次。照护工作者是自僱人员,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但却没有获得最低工资、带薪休假与病假的权利。与奥地利不同, 捷克与匈牙利同时是照护工作者的供给及接受国。两国的照护工作者主要流向德语区国家—奥地利与德国。而对捷克而言, 为私人家庭提供照护移工是一个新现象, 乌克兰则是一个重要的来源国。尽管如此, 捷克的居家照护行业规模仍然很小, 并且需要获得(非欧盟)移民劳工的居留许可证则取决于有效的雇佣合约。因为语言文化的连结, 匈牙利则主要接收来自乌克兰与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裔照护工作者, 他们不一定会往西欧国家寻求更高的薪资酬劳。此外, 匈牙利大多数居家照护移工都是非正式工作, 尽管仍有部分是正式的就业机会。

## > 疫情带来的挑战

随着疫情的蔓延, 不仅是中欧国家关闭国界, 且在未来这段时间内, 仍将停止跨国界劳动人口的流动。在奥地利, 疫情使居家照护成为媒体报导的焦点, 亦成为不同行动者的目标, 希望是能在不变的情况下持续努力, 而非寻找其他替代方案。德国、奥地利与捷克政府成功建立照护信道, 而匈牙利的照护工作者同样能够自由进入奥地利。照护工作者开始考虑他们是否应该留在家中—这意味着他们收入损失, 或是在工作国停留。在奥地利, 当联邦政府提供一次免税的500欧元激励奖金, 许多照护工作者因此延长轮班时间。在三月底至五月期间, 照护工作者搭乘自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与罗马尼亚的三架包机与六辆来自罗马尼亚的火车前往奥地

利。刚开始，照护工作者都需在旅馆中进行14天的无薪隔离。随着六月中旬中欧边界重新开放，定期的旅途路线再次向迁移劳工开放。

在疫情前几个月，因实行严格的跨境制度，越过边境返回捷克的照护工作者需要再家强制自我隔离14天。此外，他们还需要提供COVID-19阴性结果，并每14天自费重新进行检测。主流媒体报导因而将捷克迁移劳工描述为重大的公共卫生威胁。正如护理人员在线上的报告，照护工作者的家人正面临社会污名化，因为他们是当地社区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在疫情初期，乌克兰的照护工作者经常表现出不安全感、恐惧感，以及他们担心最终将面临失业、并困在捷克而无法返回家园。时至五月四号，内政部才提出一项新规定，如果在紧急状态下移工失业，将取消为期六十天的新居留证。与媒体对捷克移工状况的大量报导成对比，即便在针对关键基础劳动力的社会重要性、以及迫切需要提供他们保护性设备的一般论述中，在捷克的外籍照护者处境仍相对缺乏讨论。

在匈牙利，欠缺如奥地利与捷克的媒体报导，政府对疫情的反应带给年长者与护理人员强大的压力：成千上万的患者被迫离开医院回家，以腾出足够的病床提供潜在COVID-19患者使用。这造成对护理相关工作额外的需求，但与此同时从罗马尼亚与乌克兰来的护理人员大多返回祖国或无法顺利入境匈牙利。由于许多人因疫情失业，随之而来的是居家照护市场的动盪，民众对支付护理服务的意愿似乎下降了。因奥地利提供工作奖金，许多匈牙利籍的照护工作者愿意在奥地利待更长的时间，其他人则因需要承担家中更多的照护义务而无法或不愿重返工作岗位。在社群媒体上，在奥工作的匈牙利照护工作者对于运送罗马尼亚籍照护工作者的措施表示不满。许多人认为，给予一个移民群体这种特权将可能会增加自己未来就业的风险。

## > 结论

在疫情期间，劳动接收国与提供国的工作条件都进一步遭受破坏。尽管在疫情期间存在潜在健康、其他风险与限制，但因母国面临更恶劣的条件，移工只能被迫接受外国提供的工作。跨境照护劳动力市场常被描述为一个双赢的结果，其中，老年人获得能负担起的照护，外国照护工作者则能够获得比国内多数家庭都还

要高的薪资。实际上，这个中欧医疗市场建立在平等与一体化的欧洲神话中，却创造出一个以国籍为基础的结构不平等、形成对劳动力的跨国剥削与排斥。尽管疫情使居家照护的脆弱性重新获得关注，但照护工作者与受照护者的需求大多没有获得满足，或没有充分的解决。正因边境关闭，需要照顾的人与其亲属因缺乏公众支持而焦虑。尽管有许多措施旨在确保继续提供居家照护，但劳工在疫情前已相对不稳定的生活与工作条件，现在仍然受到忽视。由于社会关系的疏远，以及被照护者及其亲属间的距离，照护工作者面临越来越多的工作量与社会隔离。对他们而言，跨国流动可能带来传染病或必须被隔离的风险，困在母国则会面临经济上的匮乏。虽然已有关于照护工作者系统重要性的相关论述，但他们仍然被视为是对公共卫生与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威胁。因此，疫情下的社会与经济负担最终还是落在迁移劳工的肩上。■

來信寄至：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mailto: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Petra Ezzeddine <[petra.ezzeddine@fhs.cuni.cz](mailto:petra.ezzeddine@fhs.cuni.cz)>  
 Dóra Gábrriel <[gabriel@demografia.hu](mailto:gabriel@demografia.hu)>  
 Michael Leiblfinger <[michael.leiblfinger@jku.at](mailto:michael.leiblfinger@jku.at)>  
 Kinga Milankovics <[kinga@hekatetefoundation.org](mailto:kinga@hekatetefoundation.org)>  
 Veronika Prieler <[veronika.prieler@jku.at](mailto:veronika.prieler@jku.at)>

# > 南亚封锁期间的公共社会学

Dev Nath Pathak·印度南亚大学



| Arbu繪。

在以控制冠状病毒扩散为目标的封锁之下，从人的情感、苦难、社会政治危机等角度重新思考南亚的机会，再次消逝了。让我们快速地回顾这些事件的片段，可能有助于对事情有更好的理解。最近，尼泊尔和印度两国针对一块喜马拉雅山陆地：卡拉帕尼的古老争议再度展开，呼应了过往关于地缘政治国家的论述。此时正值封锁期间，社会也面临移工返乡风潮所引发的危机。针对这点尤须指出，封锁期间SAARC（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针对COVID-19所举办的会议，最终以失败收场，再次揭示南亚不过是几个成员国之间的游戏。其运作通常是成员国参与偶尔才举行的会议，且这些会议也沦为围绕他们慷慨捐助的共同资金、共享的战略利益和双边关系、安全与保障的脱口秀。现场几乎没有任何空间容纳人们的情感、社会文化动态、联系和交流。很少有人意识到，南亚作为一个尚未被充分开发的社会实体，需要根据这个地区的共同情感，探讨跨越

国家疆界的同情、同理和合作。一个令人不安的去人化南亚观点，主导并掩盖了这个地区人们的情感、痛苦和焦虑。简言之，在一个「冷血」的目标（即所谓的「COVID外交」）的主导下，关于南亚苦难、焦虑和情绪的公共社会学，完全没有机会出现。因此，一个以人与人的挣扎和奋斗作为核心、情感真实的南亚社会学，仍然是个未竟的事业。

## > 移工的危机

也许COVID-19普遍带来的影响反而是正面的：这打击了许多人原先自以为聪明的伪装，包括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自称了解移民工人的知识分子阶级。移工议题顿时在整个地区受到关注，他们具备着双重的社会存在，通常被称作「一脚在城市、一脚在村里」。针对正式和非正式经济部门中的众多工人，所有宣称了解他们的人，都被发现仍在探寻着答案。报纸和网站上的一系

>>

列评论，只呈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政策术语，或是有关这地区城乡差距的陈腔滥调。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缺陷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我们目睹了疫情期间，整个区域行政体系和危机处理体系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明显不寻常的场景，如破坏器皿、照明灯，和印度出动空军直升机撒花瓣在医疗工作者头上。由于整个南亚地区的政策和行动不当，疫情更加地成为人们恐慌的来源。也许有些零星的例外情况，但南亚各国普遍面对疫情时体察人心的方式仍是失败的。

在这个情况下，移工的返乡成为一个普遍危机，凸显了这个地区缺乏具同理心的态度。整个南亚针对COVID-19的讨论都围绕着移民的复杂性。每个人突然都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事实：移工是经济的重要骨干。南亚城市中的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都是在移工的帮助下才得以蓬勃发展。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工人仅被视为机器中的齿轮，而不是具有情绪、急迫性和感受能力的重要个体。这在整个区域十分常见。即便制衣业为孟加拉贡献了大量就业人口，孟加拉却不够重视国内制衣业的混乱，使得许多工人必须在达卡和他们的家乡或村庄之间来回步行往返，希望能找到工作。孟加拉也没有为印度和尼泊尔等远方工人规划返乡方式。在印度，曾经为汇款经济做出贡献的工人，回到印度后却沦为没有国族的移民。可以说，他们只回到了一个不感恩的国家。从印度返回尼泊尔的尼泊尔工人得徒步走很长的艰苦路程，途中却得不到任何照顾。在印度，不同阶级得到不同的安排：移居国外的移民返国时会被安排班机，但在国内迁移的人返乡却得不到任何协助。尽管有关巴基斯坦的报告严重不足，但当地工人的处境也不是很值得称讚。这些工人，

无论来自正式部门还是非正式部门，都仅被视为可供买卖的劳动力。他们不被当成有情感、神话、民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人。这代表我们需要将「南亚」重新定义为由工人所组成的社会类别。

### > 忠实于情感的南亚社会学

我们应该避免国家或地缘政治这些盛行于南亚的主流观点，以探索一种细微且忠实呈现情感的南亚社会学。借由这样的社会学，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新颖的乌托邦、一个属于人民的南亚，在其中，情感和理性可以结合起来，进而更完善地理解社会现实。这样的社会学应该要能感知到情绪流动的群众。因为在情感相对不稳定的框架内，我们可能会彼此更拉近一点，变得平等、有能力同理并具有同情心。不幸的是，印度饱受讚扬的政策「邻国优先」实际上更像是外交噱头，而不是社会文化团结的核心纲领。这项政策隐含了印度比邻国优越、因此应该照顾它们的内涵。由于这种优越性，面对疫情带来的国家衰落、人民日益提升的痛苦、希望的缺乏，这项政策便分崩离析了。比起政策噱头，我们更该做的是所有人，无论是在国界以内或之外，都能携手一同走出这个挑战。■

來信寄至：

Dev Nath Pathak <[dev@soc.sau.ac.in](mailto:dev@soc.sau.ac.in)>

# > 直面疫情的公共社会学

Michele Grigolo 及 Craig Lundy,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英国

近日,公共社会学饱受各方质疑与挑战。COVID-19疫情的散播使得社会中的不平等与族群间的差距再被扩大,同时也让大众集体意识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这样的得利思维深植于社会的不同层面(当中包含了教育场域),并再三传颂着此次疫情已经(也因此正如他们所声称地)得到控制。我们希望能以这篇文章抛砖引玉,在这次全球流行的疫情中,带动一系列公共社会学观点的响应;也递出橄榄枝,希望能有机会与以有志一同的夥伴们发展更深刻的连结与合作关系。我们想要在本篇文章中分享英国本地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简称NTU)以公共社会学参与相关讨论的经验,尤其是以公共社会学为核心的硕士学程如何参与其中。

在正文开始之前,我们先谈谈何谓我们口中的「公共社会学」。Michael Burawoy于2005年以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ASA)主席的身分,发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演说,当中提到「公共社会学」是社会学家与其所欲沟通的「群众」间共同生成及凝聚讨论议题的对话过程。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然而,对我们而言,就读于我们所开办、社会学硕士学程的学生们并不只是与我们最直接接触的第一线「群众」,我们将他们视为公共社会学家;基于他们自身的条件,他们理应被这么对待。在我们的学程中,学生们一旦加入,便并不纯然是受教者,同时也是与我们一起行动的知识生产者及社群参与者。这同时也表示本校的公共社会学论述围绕并追求着教学、研究与实践三者间如何相互推进与循环的关系。好比夜空中的星座,单个星点需要与其他的星点有所连结,才具有意义,组成元素间需要彼此的相伴与支援。当然,并不是所有公共社会学的社群活动都需要如此

直接地涵盖前述「铁三角」的所有项目;但确实依旧存在不少如我们所说,无法切割出「教学」、「研究」与「实践」的情形。就某方面来说,这些社群活动的成果也能达到强化三者间连结的效果。

这样的观点在课程内容及组织架构等面向,都引领着我们的社会学硕士学程。从理论、方法论到实务操作,我们的课程模组触及公共社会学的不同面向及取径。在我们的服务学习模组中,学生需要与在地非营利组织共事,构筑一个以自己所长为出发点、且符合组织需求及期望的专案。这些规划希望学生能够投入其中,学生参与实践的过程不仅能带来改变,也能从中学习知识,达成与大众「共学」,而非仅是「上学」。以这样的合作为基础,学生们将完成一份关于夥伴组织的报告,或是依其意愿,完成一份学术性期刊论文。他们可以尽可能提早在这两个形式中的其中之一做出选择,拟定他们在学程中的实践计划及为公共社会学带来的贡献,作为他们的学位论文。

尽管我们团队成员间有许多共同价值(像是对社会正义的认同、前述公共社会学的铁三角论述),但在追求公共社会学的路上,我们的成员间向来不乏多元性与异质性。此外,本校推行公共社会学的现况也正蓬勃发展,我们向他人取经、也得到集体的成长,我们将这两项成果视为很大的进展。这样的成果也协助我们解释公共社会学对我们而言实际上更像是「批判公共社会学」,加入「批判」二字,揭示了我们更倾向鼓励以批判的视角观察及投入现场工作。

除了硕士学程,我们也寻求其他途径实践批判公共社会学。2017年时,我们在英国社会学协会的资助下,在学校办了一场

# 「这并非关于恢复正常，因为正常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批判公共社会学的研讨会；2019年，我们几位成员(Burton、Hutchings、Lundy和Lyons-Lewis)也以〈服务学习实践复杂性的评量：因应复杂系统的理论〉为题，在《高等教育延伸与扩张(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Outreach and Engagement)》发表我们在教育学上的研究成果。我们也有部分成员投入参与式行动研究，以实证精神探究第三部门组织的劳动及雇佣状况，也有成员做的是一些新兴的议题(如：诺丁汉在地的人权议题)。在这些行动中，学术研究者、学生及社区夥伴们都充分参与其中，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起做事。

眼下，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态势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对批判公共社会学的期待。让我们先从下列问题出发：「这次疫情何以加剧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哪些指标是我们在衡量与讨论这次疫情带来的影响时所需要的？」、「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怎么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因而改变工作方向及内容吗？」对我们而言，所有对应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应该要回归到教学、研究与实践三个面向上。就在撰写这份文稿的此刻(2020年5月)，英国政府开始针对封城禁令予以解禁。我们的社区夥伴们也纷纷开始讨论起COVID-19如何影响了他们自身及诺丁汉的弱势社群。展望未来，我们的构想已经抢下先机，带我们看到公共社会学可以作为这次疫情

的最佳解，某方面这维持了社区的韧性及赋权了社区行动。高等教育部门在这波疫情里大失各方财源，身受其害的我们对疫情为社会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能否提供一个抵抗主导英国教育体系的得利思维并重塑教育意涵与样貌的机会感到好奇。

说到头来，我们想要在更强烈且更庞大的社群归属感中走出这次疫情的阴霾。以批判公共社会学家的身分对抗现在的封城状态为人们所带来的孤立与恐惧是重要的，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社群、乃至社会的中心地位，并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所谈论的，并非如何回复正常，因为正如已经被指出的种种说法，所谓的「正常」其实也是眼下所面临问题的一部份。我们所追求的，是如何让情况可以更进一步，达到更好的境地。我们猜想，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可以以批判的视野达到这些目标。基于上述几点理由，我们想要听到更多其他公共社会学的研究者及学生的计划及想法。我们满怀希望，期待能在缔结彼此关系的同时，也能寻求与赋予公共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更多意义。如果对于参与这场大对话有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來信寄至：

Michele Grigolo <[michele.grigolo@ntu.ac.uk](mailto:michele.grigolo@ntu.ac.uk)>  
Craig Lundy <[craig.lundy@ntu.ac.uk](mailto:craig.lundy@ntu.ac.uk)>

# > 保持社交距离： 社会学的视角

Syed Farid Alatas, 新加坡国立大学



人们在Covid-19疫情期间保持物理上的距离。来源：Mick Baker/flickr.com。保留部分权利。

这个标题其实只是向读者介绍社会学的借口。为了答谢你们纵容我的任性，文章最终还是讨论到保持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ing)，并指出这个名词的错用。但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先搞清楚社会学是什么。

## > 社会学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这门学科的创始人伊本赫勒敦 (Abd al-Rahman Ibn Khaldun, 1332-1406) 谈起，他是前现代时期最杰出的穆斯林学者之一。他创立了一门全新的科学，并称之为人类社会的科学 ('ilm al-ijtima' al-insani)——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学：一门研究社会的学科。用匈牙利的德国社会学大家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1893-1947) 的话来说，社会指的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不同形式，包涵社会接触、社会距离、隔离、个体化、合作、竞争、分工、社会整合等。这些生活的形式，使人们得以在不同类型的组织与群体中聚集、生活和互动，形成社区和社会。理解社会和群体生活的本质，对于理解社会

行为和社会事件来说是很重要的。伊本赫勒敦便帮助我们厘清了这一点。

为了指出理解社会的本质，对于区辨历史中的事实与虚构有多重要，赫勒敦以摩洛哥伊德里斯王朝 (Idrisid dynasty) 的统治者——伊德里斯 (Idris bin Idris, 803-828) 的后代举例说明。有些传闻表示，这位君主的儿子，其实是他的母亲和一个客人 Rashid 的外遇关系中所生。事实上，伊德里斯是嫁入柏柏 (Berber) 部落，并和族人一起生活在沙漠中的；在赫勒敦的社会学观点中，从沙漠民族的本质来看，婚外情不可能在其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如果我们对沙漠游牧民族的社会有所了解、知道他们如何互动，并了解他们的社会条件，我们便能得出伊德里斯的儿子不太可能是婚外关系的产物。

综上所述，社会学的主旨是理解社会的本质、厘清社会因素如何在社区、社会和文明发展中运作。为了解释人类的相互作用、合作和交往，社会学的观点往往离开了学术界。它们被政治家采纳和扩展，并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

>>

## > 拉惹勒南、雷根与伊本赫勒敦

曾担任新加坡外交部长(1965-1980)和副总理(1980-1985)的拉惹勒南(S.Rajaratnam, 1915-2006),便以伊本赫勒敦的观点来思考新加坡21世纪的未来。

在1979年12月的一次演讲中,他探讨了一个社会如何获得并驾驭德行(virtu),在马基维利的道德品质观点中,德行指的是使人能掌控局面的特质,如尊严、勇气、技巧、强硬和无情等等。唯有透过德行,一个社会才能处理与其未来息息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与科技力量;若是面对这些力量而不采取行动,将会导致社会的衰败。在伊朗革命期间,拉惹勒南对于社会的观点逐渐成形,也让他得以反思伊斯兰文明的崛起和衰落。在他的朋友——社会学家 Syed Hussein Alatas 的建议下,他阅读了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Al-Muqaddimah)》,其介绍了阿拉伯人、柏柏语族和其他民族的历史。

拉惹勒南认为伊本赫勒敦的核心概念「asabiyya」,指出在部落、村庄和拓荒者聚落中的群体团结感,是游牧社会与城市居民相比更具弹性、坚韧、勇敢、自力更生能力的原因。正是asabiyya的纽带使这些游牧民族得以征服城市、形成新的王朝。拉惹勒南认为,伊本赫勒敦所提到的「asabiyya」,其实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德行」概念。

在拉惹勒南的演讲约两年后,美国总统雷根(Ronald Reagan)引用了伊本赫勒敦的名言:「王朝初期,小额征税便能取得大量收入;在王朝末期,大量课税却只能产生少量收入。这是因为王朝受到宗教法条的规定,只能征收慈善税、地税、人头税等税目。」

雷根总统将伊本赫勒敦列为供应学派经济理论较早的支持者,并基于此理论设定许多政策。根据这个理论,降低税率将会刺激经济、产生更多的税收收入。雷根更引用了伊本赫勒敦的说法,表明:「我们正尝试走向小额税目评估与巨额税务收入的方式。」<sup>2</sup>

对伊本赫勒敦来说,「asabiyya的衰弱以及统治阶级对于财富的追求,会导致更高的税率。随着统治精英发展出更繁杂、更奢侈的生活形式,预计收取的税务自然要增加。这最终会导致生产活动减少或停止,并使税收收入减少,形成生产和财政周期的下降,最后促使王朝走向灭

亡。拉惹勒南也对此问题有所研究。他认为面对21世纪的来临,新加坡需要透过马基维利的德行,或是伊本赫勒敦所说的「asabiyya」,才得以在世界反复无常的力量之下倖存。

## > 涂尔干与自杀的研究

心理学是一门关于心智与个体良知的科学,而社会学则将集体良知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进行研究。集体良知使社会得以构成,包涵了一般人的共同道德、宗教、集体信仰、情感等等。相较于心理学的解释是从特定个体出发,社会学的解释旨于从群体特质理解群体中的事件原因。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是现代社会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致力于将社会学划定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借由对自杀的研究来显示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差异。

涂尔干之所以研究自杀,不只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现象很重要,也是为了向学术界证明,在面对一个似乎用心理学就足以解释的个人行为上,社会学也可以发挥特定的作用。

涂尔干试图解释不同群体之间自杀率的差异如何出现。他认为,假设生物和心理因素在不同群体之间保持不变,那不同群体间自杀率的差异很可能是由社会因素导致,而非生物和心理因素差异。借由其他因素的排除,他得以透过实证法来检验理论,例如因为同一种族中不同群体的自杀率有所差异,而排除了种族的因素。

涂尔干借由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整合程度和规范程度等社会事实,来解释不同民族自杀率的不同。整合和规范差异,会导致四种类型的自杀: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序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

让我们以其中两种自杀为例。利己型自杀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没有很好地融入群体。如果集体良知薄弱,而放任人们能恣意地追求个人利益,这种不受限制的利己主义就会导致个人的不满。并不是所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而就算需求被满足,也会有更多的需求形成,而最终产生不满;甚至会导致一些人自杀。如果个体生活在一个紧密结合的群体中,如家庭或宗教团体,这些群体将会提供强大的集体良知并阻止自杀的发生。

利他型自杀则发生在社会整合过于强烈的时候。1978年,吉米琼斯牧师的追随者,集体在

>>

盖亚那的琼斯镇自杀，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牧师的信徒们心甘情愿地为他喝下毒药，并将毒药分给自己的孩子。身为这个紧密且团结的社会中构成群体的一份子，他们被说服或被迫接受自杀，同时相信这是他们的责任。

如前所述，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学科，其关注人类之间的互动、合作和连结，以及社会因素如何在他们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在保持社交距离的议题上，这又能为我们提供什么见解呢？

### > 这真的是保持社交距离吗？

在COVID-19疫情肆虐期间，「保持社交距离」这个词逐渐为人所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保持距离指的是「和他人之间至少保持1公尺的距离。」，许多人将其称为社交隔离，也就是在公共空间的人与人之间保持物理空间，避免聚众行为与大型聚会。

社交隔离实际指的是物理上的隔离。许多对于社交隔离的定义的确也被以物理性隔离来认知，这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把社会的(social)与物理的(physical)概念混为一谈。

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是一个社会学中很重要的概念。在公共卫生领域，这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词汇，但在社会学理，这个词可以回溯到二战时期之前。虽然当时这个词的涵义并非物理或空间上的距离，也并不代表社会距离与物理距离这两种意义无法同时存在。

社会距离指的是缺乏社会接触(social contact)的程度，而物理上的距离并不影响这点。有初级的社会接触，也有次级的社会接触；初级的社会接触有着频率较高、更亲密的交往，例如初级团体中面对面、直接的视觉和听觉接触，像是家庭成员、同事、朋友等。社会接触也可

以是次级的，例如和不属于自身群体的人之间，频率与亲密度较低的交往。不管在哪种情况中，社会接触考量的都是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亲近性，而不考虑物理上的接近程度。

两个人之间可能在物理上距离很遥远，却在社交上很亲近，具有社会接触。一对因为COVID-19疫情旅游限制，而被分隔于两国的情侣，却透过社群媒体联络对方，这并不是「保持社交距离」。即便在物理上分隔，他们也具有亲密的社会接触。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物理上很接近却没有社会接触也是有可能的。举两个过斑马线的人为例，虽然他们物理上很接近，两人之间却可能是陌生人的关系。他们的行为举止并不是以对方为对象，两人之间也没有社会接触。再举一个在杂货店购买商品的例子，即便物理上很接近，社会接触却是转瞬即逝。

在这样的疫情时期，我们应该要鼓励的是物理隔离，而不是保持社交距离。能够限制病毒传播的，也只有物理上的隔离。由于物理隔离导致近距离社交行为难以进行，我们更应该提倡其他形式的社会接触，而非鼓励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需要应当开始思考，并厘清自己想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针对物理隔离与社会接触进行反思，进一步讨论在保持物理分隔状态下，如何强化与他人的社会连结。■

來信寄至：

Syed Farid Alatas <[alatas@nus.edu.sg](mailto:alatas@nus.edu.sg)>

- 1.「拉惹勒南的今昔展望」，《海峡时报》(“Raja takes a look at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he Straits Times*), 12月21日, 1979年。
2. Robert D. McFadden,「雷根引用伊斯兰学者」, (Robert D. McFadden, “Reagan cites Islamic scholar,”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10月2日, 1981。

# > 现代印度社会学的先驱

Mir Suheel Rasool, 印度喀什米尔大学



| Yogendra Singh, 2018。

Yogendra Singh (1932-2020) 是印度后殖民时期的知名社会学家。Singh 是知识圈和学术圈的重要人物，在印度社会学界，Singh 针对社会阶层、社会变迁/延续性、印度社会学、现代化和文化变迁等领域的工作，都具有开创性的成果。他的书写涵盖了多元的主题和观点，却总是能对不同主题抱持相同程度的关注，自在地在各个研究主题之间穿梭。

Singh 教授率先研究和剖析了 [印度社会](#) 的现代性和传统。他的多数研究都和现代性、传统和社会阶层有关。他使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来理解并分析印度社会。他在1973年备受瞩目的巨作 [《印度传统的现代化 \(Modernization of Indian Tradition\)》](#) 为印度社会学开启了新的视野。他还参与十本专刊和书籍的制作，包括

《人类的形象 (The Image of Man)》(1983)、[《印度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 \(Ideology and Theory in Indian Sociology\)》](#) (2004)，以及主编了《社会科学：传播、人类学与社会学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2010) 的部分系列，在这些著作中他针对资讯理论和社会学的相互作用，详细讨论了符号和传播的意义。

Singh 教授有坚定的信念，鼓励异议，并善用公开对话作为社会学论述的方法。即便在当前疫情期间，他的关怀重点仍然是社会学典范的改革，希望借此解构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危机。Singh 骨子里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并相信理论的经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被称为「社会科学家」，超越了狭隘、纪律分明的学科分类。他在 [《社会学公报 \(Sociological Bulletin\)》](#) 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知识的社会学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重要性，呼吁客观性和现实主义。他号召印度社会学与国际的「参考模型 (reference model)」脱钩，并做出一份 [锐利又精準的目錄](#)，细数社会学所面临的新挑战。他强调田野研究的重要性，因为田野研究能够显示并记录「社会空间 (social space)」的客观存在和历史特征。他深信知识和科学的民主化。他发展出一个综合模型来研究印度社会的结构和文化面向。他认为每当研究一个特定的空间脉络时，都需要发展出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在一次采访中，他描述了右翼民族主义的崛起与 [中產階級焦慮的興起是一致的](#)，并提出面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政治的「明显威胁 (accentuating threat)」时，追求教育进步才是解方。

Yogendra Singh 描绘了印度社会学如何围绕「村落研究 (village studies)」的主题发展自己的论述，并在1950年至1980年面临概念本土化的困境。当时的主流社会学，除了以美国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 为根基外，辩证唯物主义 (dialectical-materialist) 式的观点兴起，在那

几年也相当具有代表性；而上述两项发展对于形塑印度社会学都十分重要。Singh相信印度社会学具有进一步适应和改变的内在潜能，包含以下两种方向的争议：定义、重塑全球社会学的通用论述，以及与印度的历史性、文化特殊性、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同步的概念本土化。他的观点启发了我们去描写印度社会学独特的论述，贡献远不只是引入西方社会学的概念而已。

Singh教授一生中曾是多个著名组织和机构的成员。他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JNU) 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系统研究中心的主要设计者和创办人之一。由于他谦虚的个性和知识上的诚实，他在爬上学术等级顶端的过程中从未表现出过度野心。他很少关心学术界的政治，所关心的大多与学术有关，这也反映他在整个学术生涯里劳累地贡献的书写当中。除了在印度各个机构中教授社会学、设计社会学课程纲要之外，他还向许多学生和研究者传达了理解社会的理性、激进途径。晚年的他依然充满能量与活力，孜孜不倦地进行着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Singh教授的思考和写作方式对当代社会学和印度社会产生了长远影响。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研究方法，且不相信模糊的思路。他坚信要研究真正影响个体行为和态度的社会事实和社会生活，同时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彻底改变的社会。他针对影响印度社会最本质的问题进行深入且透彻的研究。他的许多著作时至今日还可以对应到当代世界，且和他最初完稿时一样实用。

随着他的离世，印度失去了一位有远见的社会学家，他在印度社会学重新定位和现代化上的贡献和努力永远都不会被忽视。从培养研究精神，到深入钻研社会议题、进行分析性研究，Singh教授留给后世的贡献，于学生的心智中刻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记。我们会永远记得他是一位社会学家、老师、哲学家，更是一位在知识节操上无可挑剔的人。■

來信寄至：

Mir Suheel Rasool <[mirsuhailscholar@gmail.com](mailto:mirsuhailscholar@gmail.com)>

# > 论重新整合基进观点的紧迫性

S.A. Hamed Hosseini,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要发展改革性的反抗, 我们需要寻求行动主义和改革性学术的整合。  
由Hamed Hosseini 设计。

COVID-19危机已经告诉我们, 基进的转型以避免更大的内爆是无可避免的。经历迟缓成长或去成长的阶段, 也就是集体的共在其重要性胜过于享乐主义, 让我们警醒到要回到过去那种发展主义的模式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必须将资本主义神话中「没有资本主义外的替代方案」这种致命的认知病毒隔离起来。痛苦的封锁经验让我们反思我们身处的位置、我们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以及我们如何结合创意的想像和政治行动来形塑后疫情世界。

## > 我们身处在哪里?

身处在封闭的囚室, 缺乏以全球为尺度的基进且广泛的行动, 人类正前往文明崩解之路。崩解的过程像是一连串相互关联的灾难: 地区性的气候灾难、全球系流行病、经济衰退、严重的食物、水和能源危机导致的大量移居人口和不安、全球性的冲突及内战、更严重的气候灾难以及物种多样性的加速消失。

## > 我们如何到达这个地步的?

简而言之, 一种源自欧洲殖民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相互交织的文明型态在过去数十年间在世界获得主要地位。这种遍于世界的文明体系根基于: (1) 资本取代劳动力成为最终价值 (2) 炭-石油或一般来说叫做榨取主义 (3) 经由持续不断的商品化社会-生态关系以及几世纪来不断占用共有财和推行消费文化来达成经济成长。(4) 殖民性, 经由不断阶层化权力关系和维持相互联系阶序和阶级的知识型。(5) 贪腐政治, 经由金融垄断的资本、利益导向的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监控人民、使用大数据、生物或神经方面的科技和战争。我将上述五点称为五个内在特征(5Cs)。

五个内在特征对于地球的资源所需无度, 这个特质让文明自身极易陷入危机。既然我们早已

超越地球的生物承载力，而目前也没有科技能解决这件事，因此我们可以说使现代文明进步的特质同时也造成他的毁灭。

### > 减碳并不足够

如果只针对上述五个内在特征其中之一做改善，而不做全面检讨改善，改革将不会成功。以许多进步派组织提倡的减碳为例，目前这个最受欢迎的解决之道面临的问题是，科技本身受到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阻碍，进步的幅度太慢了以至于难以拯救地球。更重要的是，这些改善能源问题的科技背部被的统治阶级视为扩增资本霸权的手段。

而所谓的后碳政策(post-carbon policies)其实使我们更加仰赖上述五个特征。科技革命的立基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和生命政治结构，同时也生产他们，这些结构面的问题必须被挑战，才能有意义的转换到下个能源的使用阶段。这些必须执行的措施不只减碳，还有去资本化、去发展主义、去殖民化并深化民主机制(五项措施以下简称5Ds)，换句话说便是克服上述五个内在特征。因此如果将减碳视为适切的解决方案，他可以扮演与其他五个同等重要解决方案的首要目标。

### > 我们作为学术倡议者能做甚么？

面对全球危机最化约式的方式就是最近政治科技官僚的复兴。这样的科技官僚每次的失败就越增加其集权的力量。大学原本作为创新与新一波知识的发源地，正逐渐因为在经济紧缩时期大企业与企业夥伴成为大学主要资金来源而失去自主性。人力资源与社会学(HASS)正面临认同危机，他需要找出自己的论述来重新找为他自己过去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一个「基进改造性的奖学金」方案必须被设置来执行进步的替代方案(如同由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formative Global Studies的作者所做的那样)。

为了回应没有效率的科技官僚，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自发的创意和草根性的计划来推动各种形式的系统性的过渡方案。许多人已经了解到致力于历史上文明层次的必要性，这种转变已经被许多推动5Ds运动的人认识到。

2020后十年年可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时间，其中“要求不可能达成的事”成为新兴革命力量的唯一“现实”选择。当前以经济和生态危机加剧为特征的局面，很可能转化为前所未有的不满。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处于一种状态，即如果不从现场的激进力量获得洞察力，就无法解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断裂。

然而，这些力量是多样的，无组织且发展迅速，因此很难理解。直到最近，由于新冠肺炎带来的封锁和经济放缓，这些变革性力量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透过线上互动来与大广大的群体互动。尽管5D的概念有助于解放当前困境的潜力，但遗憾的是，它仍然是HASS的边缘议题。

### > 共同开创知识共享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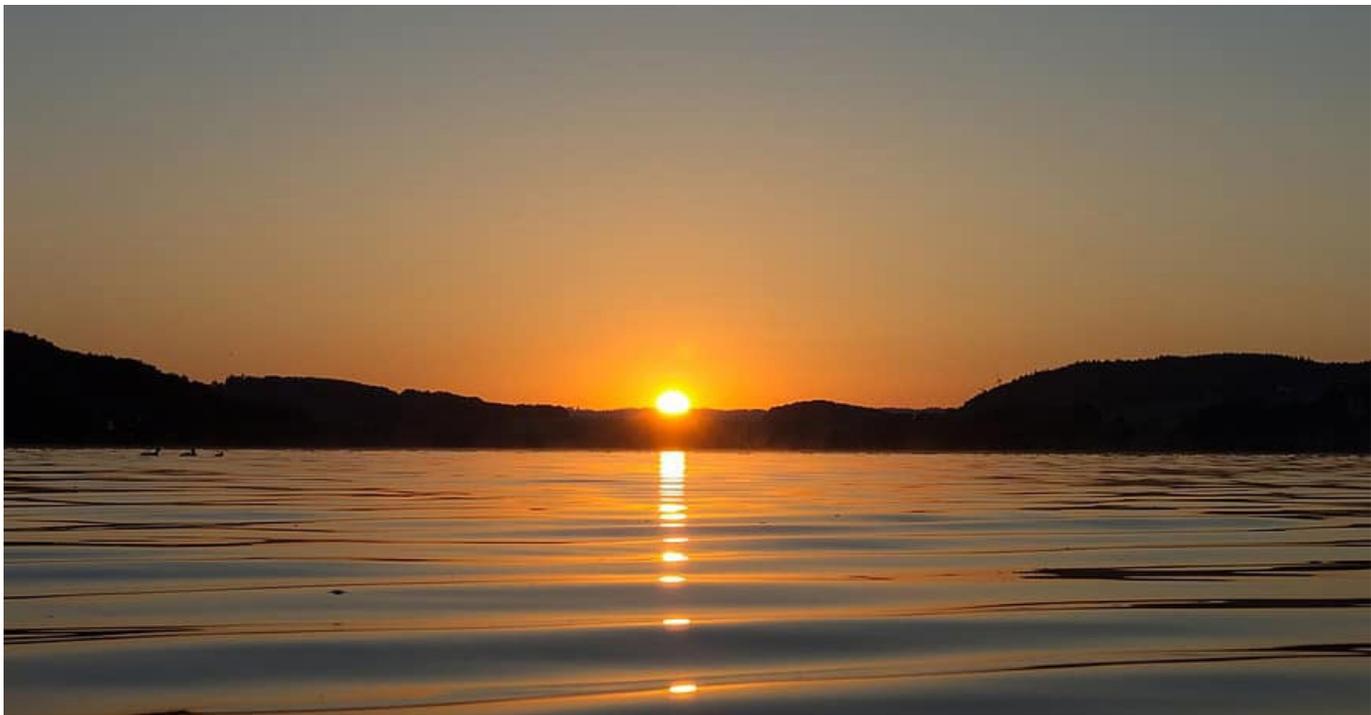
在进行上述5D的行动时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共同发展”一种动态的且能包含原本行动目标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培力这些改革行动者。没有理由相信危机的加剧会自动导致全球左翼中那些毫无贡献的分支崩溃。期望从5D的相互互动中会偶然地在市场形成一个新的典范并神奇地结束资本主义，这样的幻想和新古典经济学相信的「看不见的手」和「涓滴理论」一样讽刺。

当前的情况是，由于倾向资本的行动本身损害了共同体的利益，权利和需求，因此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做的努力、对于与建设的可持续性、自给自足、公正、民主的未来并抵制和逆转资本家所建立出的知识，这些都至关重要。在不屈服于HASS的技术官僚思想的前提下，可以运用社会资讯学的最新方法论来自我培力，以将自己由资本主义打造的知识中解放出来。也可以利用大数据的力量和草根运动共同创造「知识共享」，以给予5C后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向。■

来信寄至：  
Hamed Hosseini <[hamed.hosseini@newcastle.edu.au](mailto:hamed.hosseini@newcastle.edu.au)>

# > 「Koyaanisqatsi」之后： 文明的再想像

Barry Gills,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在文明中的主要权力和社会组织模式，必须在未来被深刻的重新设想和改变。

在当前的危机中，有一种新颖的观点在全球蔓延的讨论中引发热议，其认为现代形式的世界秩序和文明，导致人类及自然陷入了重大的危机，而我们应该要彻底地改变世界的构成。气候(Climate)、资本主义(Capitalism)与疫情(COVID-19)这三个「C」，也就是所谓的「三重危机」，促使人们尝试找出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

## > 生活在 Koyaanisqatsi 的时代

北美的霍皮族人有个神话和我们的现代情境非常有关：那就是「Koyaanisqatsi」，通常被译为「失衡的生活(life out of balance)」、「一种不应该存在的生活形式(a form of life that should not exist)」、「疯狂的生活(a crazy life)」。

在这个神话中，人类是所有生命的守护者，其存在目的是要永久地维持各种形式生命之间的平衡。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自身的生活形式，

应该要能与其他形式的生命保持和谐。然而在 Koyaanisqatsi 中，人类已经失去了理智，并在自身的行动下，漫无目的地奔向毁灭的境地。在此形式下，文化视生命之间基本的连结为无物，并将生命的神圣性与初衷抛诸脑后，遗忘了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深刻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文化的行为是毫无人性(mindless)且毁灭性的。唯有深沈的精神觉醒，甚或是文化与物质上的重构，才能够转变这样的文化进程、拯救文化本身，并将其他形式的生命从 Koyaanisqatsi 注定带来的危害中拯救。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 Koyaanisqatsi 的时代。「进步」、「现代」、「发展」、「全球化」这些概念，就像咒语一般地操控了我们，让我们以为美好的未来终将来临，使我们深刻地相信，世界将迎来物质的丰饶、未来时代的健康、安全、自由。然而事实是，这些概念将那些导致现代全球危机的历史过程，伪装成美好的样貌。

>>

有关于人类「文明的衰败」与「存在危机或挑战」的研究，如今在学术上已逐渐获得正当性，甚至受到欢迎。这样的现象，也显示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正活在主流文明的某种「大崩毁」、「世界体系危机」或「普遍危机」之中。导致这种「普遍危机」或「大衰败」的众多原因，甚至可能导致主流文明形式的崩坏。气候变迁不是唯一一个促成此种危机的因素，从许多角度来说，气候变迁本身就是更加根本的长期历史进程所带来的后果。引发这场危机的历史进程，包含：寡头化（oligarchization），也就是财富的过度集中；对劳动和自然的剥削、过度从人类劳动和自然界中提取价值以增加系统熵；资本与财富剩馀的附加性和竞争性累积，以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对商品化、市场化和经济成长的系统性逻辑与迷信。

主流的经济学不管在学术或实际运作上，都存在一种错觉，认为经济最终并不会遭遇生物在物理上的极限。在主流经济学之中，环境或环境经济学，都只是个次要的次领域；他们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体系造成的所有环境问题，在未来都能透过科技创新、市场原则与机制解决。这种狭隘且盲目的世界观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使得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政治行动者，在面对需要积极处理的气候变迁与生态灾害问题时，不断地重现自满与拖延的心态。对于世界过度乐观的认知，和对于「市场」的崇拜，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信仰，也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等霸权思想的核心，并在全球受到理解与实践。

危机意味着崩溃，也意味着系统性的失败。现代世界的危机，反映出整体人类的存有危机——这个理应受全球化影响，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的文明，将迎来衰落甚至崩毁。

## > Koyaanisqatsi 同为解方

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Koyaanisqatsi便是答案。我们需要针对文明、精神与物质文化进行深度的修复——我在2020年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期刊上投稿的文章中，详细地解释了这个概念。我们需要「重新想像」我们的文明，因为在其中构成权力与社会组织样本的，是国家、资本、都市等基本形式；我们必须要在未来重新想像，并从根本上改变它们。人类必须认识到自己镶嵌在生命之网中，并充分理解现实的样貌：星球边界、地球系统动力学、生物物理基础、生物物理极限、生态与气候变迁临界值——人类事实上是身在一个具有统一性的生命系统之中。

在未来的进程中，除了深度复原地球上的生命，并重建其庞大且美好的多样性，也要翻转至今主宰了集体物质生活的、对于商品化、市场化和经济增长的迷信。在物质和社会层面上重建这个世界，将会是把文明从本质上重构的关键。国家内部与全球的和平，将成为文明复兴与再想像的基本要素。充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力量的黑暗时代，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现在也该结束了。

历史尚未成定局，但未来将取决于现在。当前全球系统性危机下出现的新世界观，其实和一种非常古老的世界观有所相似。要回复COVID-19疫情时代来临前的「正常」，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期待着商业能够回归以往，更是一个灾难性的想法。只有彻底改变我们文明的基本形式，才能避免未来的灾难。这样的改革行动正是实现于多数人身上；不仅由多数人执行，更是为了多数人而实践。这也是关乎人类集体生存的唯一现实前景和希望之源。如今，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的借口、也不能再走回头路。■

来信寄至：

Barry Gills <[bkeithgills@gmail.com](mailto:bkeithgills@gmail.com)>

# > 拉斯塔法里运动及西印度的再发明

Scott Timcke 和 Shelene Gomes: 千里达托贝哥圣奥古斯丁的西印度群岛大学以及ISA移民社会学研究委员会(RC31)成员



2009年于衣索比亚沙沙马的一个告示牌，暗指塔法里的存在。  
来源:Shelene Gomes

1930年拉斯·塔法里·梅科嫩(Ras Tafari Mekonnen)加冕为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皇帝，如电影般庆祝着衣索比亚生活的新纪元。在加勒比海12500公里以外，在英国统治下可怜的牙买加黑人正看着这壮观的新闻片段。他们第一次见到黑人皇帝。

文献记载着当牙买加人在由报纸和杂志得知这项消息后，竭尽所能地开始了解衣索比亚。Marcus Garvey在他的戏剧非洲国王与皇后的加冕中捕捉了这个强而有力的象征。牙买加人满怀希望的眼神是对于恐怖的种族资本主义的回应。

## > 一个反文化的现代性

从黑人经验出发的资本主义史是一个十分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史。虽并不完整且

并非毫无问题，拉斯塔法里运动(Rastafarians)的确是Paul Gilroy所谓的反文化现代性。千里达群岛出生的C.L.R. James和Claudia Jones反转了正统上对于现代性的分析，将西印度群岛置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拉斯塔法里运动同样地也是标志性的运动，他以通俗的概念来处理奴隶解放的计划。这样的思考反转了一种由上而下、由国家或体制所发动的社会改革才是最恰当的概念。

确实，拉斯塔法里的世界观是一个说明受压制的主体如何设想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例子，并从中奋斗。因此，长期以来影响着加勒比海民族学与社会理论的拉斯塔法里运动和以加勒比海本位为基础的改造，能够在这个世纪帮助发展解殖社会学。

## > 解殖社会学的元素

让我们从人民的社会运动开始，来展示学科的限制是可以被松动的。从2008到2015年我们将多个关于后殖民西印度的社会理论家

的田野资料汇整起来，我们从中了解到拉斯塔法里灵性的实践是有机知识分子尝试提供他们每日生活处境一种社会学解释的产物。拉斯塔法里运动的核心构成中，「全球政治」(cosmopolitics)的概念提供了他们社会世界中丰富的描述，如同Rodney将拉斯塔法里运动是为他立足于后殖民牙买加写作的基础。

二十世纪后半叶，拉斯塔法里运动的成员一波波的从加勒比海移往衣索比亚的莎莎曼城(Shashamane)。定居在由海尔·塞拉西一世专门为离散非洲人划定的土地，莎莎曼城组成的共同体代表着潜在的泛非洲社会的政治主张与想像，而且可能成为真正的实践。衣索比亚与是许多拉斯塔法里运动成员指涉人类起源和锡安圣地的地方。因此，到莎莎曼城定居又被称为一种回归，这样的行动标志着自我改造和以他们喜爱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

有鑑于这个神圣的地点，支持拉斯塔法里运动的人不断到莎莎曼城朝圣，并在经济上支持了当地社区。这种支持对于伊索匹亚拉斯塔法里运动的价值观的维系和再生产、社会进步和宗教社群的认同格外重要。拉斯塔法里运动带给其信徒尊严以及这个运动与神性的连结是一连串恐怖的长期殖民宰制的后果。这种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连结的观点并不由殖民帝国的中心长出的，而是由拉斯塔法里运动的成员所发展出的。

### > 拉斯塔法里运动的「世界政治」

拉斯塔法里(Rastafari)不仅认为伊索比亚是基督的堡垒，而且他们欣赏伊索比亚是唯一从未被欧洲大国正式殖民的非洲领土。拉斯塔法里运动是建立在一种理想化的非洲作为思想抵抗的基础，开始相信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是神圣的。这种信仰的背景来自加勒比海人民对圣经的熟悉。当然，拉斯塔法里教主义也是从奴隶贸易

中侥倖存活者产生的宗教活动产物。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初整个牙买加的宗教组织开办学校，圣经也逐渐为普通百姓所熟知。

就是经由教义的重新诠释而非世俗组织的动员，共同地抗白人至上的运动才可能成形。从这些再诠释中，我们找到拉斯塔法里教将在加勒比海支持殖民压迫的基督教实践给去殖民化。

在这个框架中，拉斯塔法里教拥抱了一种共同的人性，接纳了那些信教者与异教徒。这样的回应可以被解释为，我们看到一种形成中的南方世界政治，坚持开放与多元的态度。拉斯塔法里的开放性根植于对于加勒比海社会性的历史意识，包含跨洲的种植园经济的历史、阶级和多元文化的环境，并从社会互动中形成自我认识。就是这些直接挑战了白人至上的概念。

拉斯塔法里绝不是第一个表达泛非主义的，Paul Gilroy、Hilary Beckles和 Robert A. Hill都展现了这方面的努力。尽管如此，拉斯塔法里运动的日常实践有助于理解「日常团结」这个概念的经验 and 概念的探求。日常团结提供了进一步思索由南方世界主义的框架来进行社会学的想像，这些想像根植于黑人经验。

作为日常团结的一个例子，拉斯塔法里的世界政治概念帮助社会学者强调在地情境其实与世界密切相关。经由这些曲径提供的丰富描述，我们能开创一种基于黑人经验的社会学，他的特质是去中心、去殖民，并将二十一世纪不断出现的不平等给概念化。经由这样的方式，具有解放潜能、接地气的西印度社会理论才能持续下去。■

來信寄至：

Scott Timcke <[stimcke@gmail.com](mailto:stimcke@gmail.com)>  
Shelene Gomes <[sshelene.gomes@sta.uwi.edu](mailto:sshelene.gomes@sta.uwi.edu)>

# > 全球和在地脉络下的 斯里兰卡社会学

Siri Hettige, 斯里兰卡可伦坡大学, ISA教育社会学委员会(RC04)、贫穷、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委员会 (RC19)、青年社会学委员会(RC34)研究员



1921年的锡兰大学学院。  
来源:创用CC。

我们都知道,许多非西方社会从16世纪初开始陆续受西方殖民统治。斯里兰卡,旧称锡兰,是印度洋中的一座小岛,从1505年到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为止,陆续由三个殖民势力掌控,分别是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斯里兰卡在殖民主义下经历了大幅的转型,特别是在英国统治的150年期间。所有转变中,最值得讨论的是教育环境的变化,从由宗教机构主导的初级教育体系,转变为更多样化的通识教育体系。然而,现代大学教育体系是直到殖民

统治将近结束才引入的,使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本土杰出青年势必要出国接受这类教育。因此,在斯里兰卡成功向上流动的在地人没有机会获得多元领域(如社会学)的大学教育,而社会学却早已是许多欧洲和其他地区大学广泛教授的学科了。

## > 大学教育的扩张

由于大学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后殖民时期发展而成,社会学教学不得不等到1940年代本土大学建立后,方能开始实

施。随着接下来大学教育需求的增加,几所新的大学又在后续的几十年中陆续建立。然而,社会学教学仍然局限于佩拉迪尼亚大学,直到1969年,也就是独立后的二十多年,第二个社会学系才在可伦坡成立。

重要的是,随着佩拉迪尼亚大学的成立,社会学系也在甫被任命的系主任安排下设立,这是在1950年代初期。它最初由美国社会学家Bryce Ryan教授主持。由于教学所使用的语言是英文,因此可以使用英文的、在西方国家和其他

地方被广泛使用的社会学文本。然而，随后几年的重大后殖民社会变化，使情况开始改变。早在独立前十几年就建立的民主政府体制，让反殖民运动有机会提出明确的要求，包含解殖、复兴本土社会和文化机构。因此，在1956年，也就是独立后仅仅八年，教学语言就从英语变成母语，开启了社会和文化改变，并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英国化社区的成员稳定外流，包含城市里的本土菁英，导致斯里兰卡人才大量外流。

1950年代中期，可伦坡郊区的两个主要佛教寺院，变成两所国立大学，这导致了许多效果，包括大学教育的大幅推广。在国家主导、公部门促成的扩张发展计划下，从1950年代开始，这个趋势持续了几十年，几所大学纷纷在国内不同地区设立，这在一个以高度垂直和水平不平等为特色的后殖民社会里，创造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和往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因为当时的经济成长水准较低，这种大学教育的稳定扩张便导致毕业生的失业率很高。

### > 孤岛的社会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英语到母语的转变使多半只使用单语言的学生失去了使用英语文本的能力。尽管后来做出了某些制度性安排，将一些关键的社会学文本翻译成母语并出版，但资源和其他限制阻碍了这个做法，使其无法持续进行。因此，多数学生大幅地被局限于只能使用本土语言的课程讲

义。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大多数学生愈来愈与其他地区广泛使用的原始社会学文本疏离。然而，无论他们受到的训练品质为何，大多数社会学毕业生都能被国家机构雇用，承担多种职务。尽管有一些学者经由研究生培训和交流访问与国外大学保持联系，其他人持续与国际学术交流保持脱节，不参加学术研讨会、不在通用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上述趋势至今依然持续存在。在第一位锡兰裔的大学社会学教授Ralf Peiris领导下，于1980年代成立的国家社会学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依然活跃，但只吸引一些本土大学的少数学者参与。此外，很少有斯里兰卡社会学家曾经是国际社会学协会(ISA)的成员。然而，他们仍然勤于教学、针对当地问题进行研究，并为当地出版的期刊做出贡献，而来自本土大学的毕业生也经常能找到政府的工作。

从上述可以明显看出，在后殖民的斯里兰卡，带有反殖民族主义(anti-colonial nationalism)色彩的政治经济学，促进了飞地式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延续，且尽管私人教育的全球化使许多公共教育体系之外的人都能找到其他形式的教育和职业发展选项，斯里兰卡社会学依然使自身独立于北半球和南半球其他地方的学术圈之外。而正是公共教育体系之外、通常条件和背景也更好的人，仍然通过超越国家疆界的私人教育系统与外界保持联系。然而，这些人

大多倾向于在理工科(STEM education)发展，而不是包含社会学在内的文科领域。

殖民统治期间和之后的变化明显形塑了斯里兰卡社会学的发展。这与古典和近代社会理论家对社会学知识的学术论述非常吻合，诸如Karl Marx (1844)、Max Weber (1947)、Max Scheler (1960)、Wilhelm Dilthey (1958)、Karl Mannheim (1936)、Norbert Elias (1956)、Robert Merton (1957)以及Peter Berger 和 Thomas Luckmann (1966)等。国内不断发展的社会文化脉络，决定了这段时间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过程。现阶段国际社会学与斯里兰卡社会学之间微弱的关系，反映了斯里兰卡社会学家在他们特定的社会文化和体制条件下发展其工作时，所面对的条件限制。■

來信寄至：  
Siri Hettige <[hettigesiri@gmail.com](mailto:hettigesiri@gmail.com)>

# > 斯里兰卡社会学

## ——历史的回顾

Subhangi M.K. Herath, 斯里兰卡可伦坡大学

斯里兰卡社会学的发展显然没有遵循一套鲜明的社会学传统,与欧洲或美洲的做法截然不同。它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高度融合,并显著地向人类学的方向倾斜。两个成因十分明显:其一是斯里兰卡过去作为英国殖民地,其大学教育由英国的教育工作者建立,遵循了英国大学体系中,人类学在社会科学领域蓬勃发展的模式。另一则是斯里兰卡过去就是传教士和旅客感兴趣的中心,并提供独特的美景、历史和社会制度;对任何有人类学视野的学者而言,斯里兰卡的社会和文化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实验室。

然而,社会学被视为大学内的一门学科进行教学,始于1947年的佩拉德尼亚大学(斯里兰卡第一所完善的寄宿大学),一些英国和欧洲顶尖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教学和研究,为斯里兰卡社会学(和/或人类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有些著名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学者仍然活跃,并大幅地充实了这个领域,产出非常有价值的社会学著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依然是主流人类学家;跨越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界限似乎仍是斯里兰卡社会学的显著特征。

### > 「斯里兰卡的社会学」的演进

在过去六七十年出现的许多社会学研究都是采本地研究的形式,不管是进行宏观社会学的理论辩论,还是诉诸微观研究,抑或是用Robert Merton(1968)的术语来说,处于「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ies)」的范围。许多早期或第二代的社会学家非常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工作以现有的国际社会学理论体系为依归,并在理论层面上进行了应用、验证和质疑,为「斯里兰卡的社会学」做出显著的贡献。无论是曾在佩拉德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服务的Edmund Leach(1961),对当时关于「经济的超级结构性支配地位(super structural dominance of economy)」的论辩,或是Tissa Fernando(1972)以Vilfredo Pareto提出的「菁英转型(transformation of elites)」框架,针对1971年斯里兰卡武装青年革命的研究,又或者是Laksiri Jayasuriya(2000)对新自由主义和福利政策的贡献等等,都落入一个浓厚理论性工作的斯里兰卡社会学传统。检视日后斯里兰卡社会学家所做的贡献,会发现很多学者的关注焦点,都是关于如何改变斯里兰

卡的社会现象,例如种姓和阶级、土地关系、政治制度、性别关系、宗教和文化,以及移民和家庭网路。近年来,学界转而关注新兴或普遍对个人、社会与不同社会团体产生严重影响的社会议题。在过去五十年中,这种社会议题本位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al issues)似乎已经在学术界和普遍读者中确立了自己作为「斯里兰卡的社会学」的地位。

### > 「社会议题本位的社会学」

许多落入这个「社会议题本位的社会学」范畴的研究成果,似乎都遵循了美国社会学早期引入的社会学传统,例如W.F. Whyte的《巷口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1943)、Frederic Thrasher《黑帮(The Gang)》(1927)、Florian Znaniecki和W.I. Thomas的《欧洲和美洲的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1918),上述著作都大幅促进了对在地微观社会议题的理论性论述发展,而非欧洲理论社会学或具有强大哲学基础的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学。今天在斯里兰卡发表的社会学成果,绝大多数奠基于广泛的田野调查所收集而来的质性、量化资料,聚焦在今日斯里兰卡社

# 「在過去的五十年裡，社會問題的社會學似乎在學術界和廣大讀者中確立了自己的『斯里蘭卡社會學』地位。」

会出现的各式各样社会议题；然而，虽然它们并非完全没有理论基础，但却通常缺乏学术工作所需要的理论严谨性和概念完整性。这种情况造成了大量社会学文学作品被生产，几乎呈现一种「新闻社会学」的风格。尽管如此，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不会使读者陷入严肃的理论辩论之中，这些研究普遍受到大众欢迎，因此不能低估这些研究的价值，它们为社会学工作带来更多广泛关注。

如今多数斯里兰卡大学都从事社会学教学，然而其教学水准和所关注的主题，却存在着明显差异。社会发展过程也带来一些影响，包括1956年官方语言政策的改变（使多数人口使用的语言：僧伽罗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不承认少数人口使用的语言：泰米尔语，以及唯一在国内被使用的国际语

言：英语）、随后发生的严重人才外流，以及学校系统中的教学语言从英语改为乡土语言，从而使新一代丧失学习国际语言和获取全球知识的机会，而这些影响依然在社会学知识的产出中清晰可见。不过，有鑑于社会正面临的巨大系统性和结构性变化，以及人们为了应对这些日常现实而采取的许多策略，新兴社会学工作内含的多样性无疑是鼓舞人心的。

但是，问题来了：「可以将这种『日常生活社会学』的研究工作视为『社会学』吗？」Max Weber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1919)中写到：「现今在青年圈子里，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只涉及冷静智力、而非人的热忱和灵魂的计算。」社会学不仅仅只是观察、诠释和评论，也和奠基于「努力工作」而出现的「思想」有关。前人

建立的知识势必会使这项艰难的工作轻松许多。理论严谨性的缺乏同时也被许多因素所影响，包括语言能力、可用资源，以及深度学习一门真正科学的觉悟，而这可能会模糊了日常社会学和日常新闻之间的差异。趁着还有时间，斯里兰卡的社会学家们应该要齐心协力拯救社会学，以免这门学科陷入根深蒂固的平庸之中。■

來信寄至：

Subhangi M.K. Herath  
<[subhangi@soc.cmb.ac.lk](mailto:subhangi@soc.cmb.ac.lk)>

# > 反思和平、冲突及暴力

Kalinga Tudor Silva, 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



2009年戰爭的最後階段，流離失所的泰米爾民眾從LTTE組織控制的領土，轉移到由斯里蘭卡武裝部隊控制的領土。

斯里兰卡的社会学始于民族学和历史学方法，以了解当地和国际研究人员在1960年代建立的一个稳定且和平的社会。这些研究试图探究构成持久制度的基本原理，例如亲属关系、土地使用权、宗教和种姓。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些研究人员几乎措手不及，并没有准备应对新的现实，因为他们面对了各种新形式的暴力社会冲突。本文探讨了1970年代斯里兰卡的暴力冲突的性质，以及研究人员如何从不同的观点着手解决暴力冲突，在期间所遇到的挑战，以及我们从这些研究可以得到哪些教训以促进和平。

## > 急性与慢性的暴力

自1970年代以来在斯里兰卡爆发的暴力有多种形式。这些事件包括贾纳塔·比蒙纳(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 JVP)的反国家

政治起义。人民解放阵线是斯里兰卡南部的一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叛乱运动。1971年以及1987年至1989年对国家对以上进行了空前的镇压。还有从1983年至2009年政府和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TTE)、斯里兰卡北部泰米尔人武装的分离主义运动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双方都发生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1983年7月，僧伽罗的暴徒针对泰米尔人执行了种族清洗，以及疑似伊斯兰恐怖组织在2019年4月21日复活节星期日针对游客的恐怖攻击。随着暴力根深蒂固，执法人员及反抗者的暴力越来越严重，所有这些冲突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自1970年代以来，每次的全国选举中都有定期发生选举后暴力事件，通常是针对落选者。用强纳森·史宾赛(Jonathan Spencer)的话说：「斯里兰卡的暴力行为通常是正规政治的加剧，不完全脱离日常政治」。

这种暴力的大多数是与身分认同有关，这是由一种稳定身份认同(无论是种族、宗教、阶级还是种姓)的渐进式单一思维所驱动的。身分认同的冲突之所以需要社会学分析，不仅是因为身分认同与前一时期的主体身分具有某种连续性，而且还是因为身分认同不适合由的经济或政治分析。有越来越多僧伽罗佛教精英采用国族主义政治来驱动独立后的斯里兰卡国家，他们佔人口总数70%以上。泰米尔人和穆斯林少数群体反对这种状态，并呼吁应该理解身分认同、利益和集体动员在后殖民情境的互动关系。

## > 社会学学科的独立性被破坏

这些发展也给社会学和人类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例如，占主导地位的僧伽罗-佛教思想体系试图压制来自内部的任何批评。例如，被背叛的佛教?(1992)人类学者谭比恩

提出一种矛盾的佛教教义，明明是一种非暴力的学说，却被用来煽动针对泰米尔人的暴力。这本书在斯里兰卡被禁，僧伽罗民族主义者的学者在僧伽罗语中出版了许多与之抗衡的宣传作品，不仅攻击了谭比恩这位来自新教、泰米尔人背景且国际认可的斯里兰卡人类学家，而且还攻击人类学这门学科。这样的攻击还指向其他学者，例如斯里兰卡的 Gananath Obeyesekere, H.L. Seneviratne, Kitsiri Malalgoda, Valentine Daniel 和 Chandra Jayawardena 在内的整整一代斯里兰卡社会学家，他们移居海外，并继续从国外进行对斯里兰卡的批判性研究。在牛顿·古纳辛格 (Newton Gunasinghe) 的带领下，只有少数社会学家选择继续在内部斗争。研究人员的定位常常与国族主义霸权相冲突，这样的霸权从内部或外部攻击任何反对者。同样，猛虎组织对泰米尔知识分子的任何异议也采取了激烈的回应，视他们为背叛泰米尔族人。因此，这样的冲突破坏了社会学科本身，使独立的客观分析变得困难，即使独立客观并非完全不可能。

随着战争进展，暴力更加剧了，包括安全部队、民兵、武

装地方帮派以及毒品走私等相互合作或冲突。战争在2009年结束，但暴力转向穆斯林，这些2012到2020年的暴力行动是由好战的佛教僧侣发起，还有2019年疑似伊斯兰组织的在复活节的恐攻，和五月十三日在特定地区攻击穆斯林的行径。除了肢体暴力外，还有包括财产毁损、威胁恐吓、胁迫、使用社群媒体散播仇恨以及例行的由国家或国民发起的歧视性行为。如同许多研究者指出的，一种坏人不被惩罚的文化逐渐确立。

### > 偏袒多数的政策带来的损害

关于官方语言的国家政策是其中一个例子。1956年当选的亲人民联合阵线 (Sinhala Mahajana Eksath Peramuna) 以僧伽罗语为唯一官方语政策，旨在改善从殖民时代开始普通人与统治该国的特权英语阶层的差距。官方的语言政策实际上孤立且疏离了泰米尔人，也限制了他们进入国家部门工作的能力。这种以大多数人为主的政策偏见未能使斯里兰卡精英意识到这将无可避免地使得用泰米尔语边缘化。当时，社会学正在斯里兰卡逐渐成为一门学科，有关语言政策的研究主要是由支持

官方政策的僧伽罗国族主义者提出。几年后，这项政策的弊端变得显而易见，国家内部逐渐出现弥补使用泰米尔语的政策。但是，伤害已经发生了。

国家在教育和发展方面的政策遵循与制定官方语言相同的模式。他们显然偏袒僧伽罗多数派，而主流的僧伽罗政党则参与了竞争激烈的竞争，以迎合多数族群争取政治利益。结构和文化动力经常合谋，为席卷斯里兰卡的暴力冲突产生正当性。

至于对和平发展的影响，任何特别的介入都不太可能成功。这是因为独立后的斯里兰卡已经建立了某种政策体系，并建立了内建的机制来破坏任何想要改善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政策。尽管微小的变化有时会产生催化性的转变，但我们处于一种很糟的情况，就是任何对于少数族群让步的政策都会被取消。这是当前和现在斯里兰卡社会学面临的主要挑战。■

来信寄至：  
Kalinga Tudor Silva  
<[kalingatudorsilva@gmail.com](mailto:kalingatudorsilva@gmail.com)>

# > 暴力分析： 斯里兰卡的国家构成

Farzana Haniffa·斯里兰卡可伦坡大学

1983年七月在斯里兰卡是许多人回想过去时的重要日子，因为它标志着种族冲突的开端。人们认为1983年七月的暴力冲突以僧伽罗为主的南部政府与斯里兰卡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结果，以及造成泰米尔人开始向外移民和离散海外。正如Pradeep Jeganathan也讨论过的那样，这也是人类学学科开始对理解「暴力」产生兴趣的时候。

1983年暴力事件刚发生后，有几本著作出版。James Manor在1984年出版的《变化与危机》中出版了大批人类学家的贡献，其中许多人当年7月正在斯里兰卡。Gananath Obeyesekere、Jonathan Spencer、Elizabeth Nissan和Roderick Stirrat撰写了小论文，都提出了重要论点。Stanley Tambiah两年后也出版著作，然后是Bruce Kapferer，之后又是Valentine Daniel和Pradeep Jeganathan。

## >1983年的背景

联合民族党(UNP)自1977年以来都是执政党，并于1978年引入经济自由化。在1977年选举后不久联合民族党的威权统治便已十分明显，选举后的反泰米尔暴力事件在选后持续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样针对泰米尔族群的暴力

在1982年公投前一年达到了高峰，1982年以三分之二多数投票通过的公投使联合民族党可以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反对此次公投的力量显著且遭到执政党打压，执政党动员了贾斯卡·塞瓦卡·桑加玛雅(JSS)工会的大批成员。执政党创立JSS本身是为了破坏工会运动中左派的支持基础，其意识形态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族主义。Stanley Tambiah(1986)和Gananath Obeyesekere(1984)记录了UNP对司法部门在内的所有反对者的威胁和恐吓，并以此作为1983年暴力事件的背景。

## >人类学家对于这些暴力的分析

1983年也使得斯里兰卡国内的书写文化产生些微改变。Jani De Silva记录了1983年之后的知识生产，例如《斯里兰卡的种族与社会变革》(1984年)和《斯里兰卡的种族面向》(1987年)这一些重要著作。前者试图打破僧伽罗人是优等的民族神话，而后者则批评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民族主义，以及支持两者的结构。社会科学批判针对「暴动」的回应是希望能影响论述和政策。

人类学家似乎渴望找出更坚实的文化解释来说明暴力的郭谟和血腥程度，而不满足于停留在以经济和政治的可能性条件层面来解释。

学者们正寻找方法来解释

这些曾有人类学家认为相对和平的僧伽罗暴徒的愤怒和暴力。因此我们参考以下学者的分析，Bruce Kapferer以及Jonathan Spencer的分析(尽管斯宾塞不同意卡普弗的观点)。他们试图提供一个解释框架来说明由UNP创造出的暴力政治空间，成为僧伽罗集体意识的元素。Kapferer将暴力比喻为一种恶魔性的东西，而这个暴力存在于僧伽罗的意识中，这样的暴力存有类似于驱魔仪式中恶魔的存有状态。在一项复杂的分析中，他分析发生暴力事件的脉络以及阶级动员的对抗，卡普弗勒将暴力本身比作驱魔。Spencer则是认政治使僧伽罗人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繁文缛节。斯宾塞进一步指出，僧伽罗人的暴力攻击是由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TTE)在北部战胜并占领，这样的情况挑战了他们熟知的寺院纪录Mahavamsa的故事。Mahavamsa是有关僧伽罗人的历史以及建构了僧伽罗人对于泰米尔人的关系，文本中描述的是僧伽罗国王如何击退泰米尔入侵者。

Valentine Daniel认为僧伽罗和泰米尔对于过去历史的理解方式有助于理解暴力的凶恶。丹尼尔主张这想群人对于过去历史的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成被暴力产生的结构性条件。这些不同的观点一

一个是认识论的层面，一个是存有论的层面。丹尼尔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及是在存有和认识的层面上拒绝认同他者的存有状态，面对他者而导致的自我身分的焦虑和根本的怀疑导致暴力产生。

## > 研究对抗仇恨形成的政治

Daniel和Kapferer都因为他们文化主义者的本质化分析框架而遭受批判。许多人呼吁对肇事者是谁以及其组织方式进行更好的分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于1983年暴力的思考和写作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理解斯里兰卡当时的政治的方式，而这种思考方式本质上受到当时泰米尔民族主义和

僧伽罗民族主义的对抗的影响。这种分析排除了对结构特征的理解，而正是这种结构特征维系了对抗的持续。

对于分析暴力的学术生产远不及对于另一种暴力形式-战争的分析。因此，这些人类学家的分析方法-所谓原生论，即因种族、宗教或身分认同而产生(primordial enmities)的敌意-并没有更进一步追问使得这些冲突持续产生的结构特征，或是是甚么样的政治系统使得这些对抗得以维系-不管这些对抗是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或伊斯兰恐怖组织。我们目前仍然无法跳脱由国际恐怖主义的分析框架来看这些冲突发展。我们现在应该重新检视

1983年暴力事件有关的知识生产，以从这些仇恨滋长的过程学到一课。■

來信寄至：  
Farzana Haniffa  
<[ffhaniffa@gmail.com](mailto:ffhaniffa@gmail.com)>

# > 微微之界： 斯里兰卡的社会学 与人类学

Premakumara de Silva, 斯里兰卡可伦坡大学, ISA宗教社会学委员会研究员

从外国和当地社会学家过去针对斯里兰卡社会与文化的大量关注,可以发现在斯里兰卡,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具有深厚的传统。此传统较为显着的贡献,可以在过往这些助益良多的书目调查中发现,其研究对象包含 Ian Goonetilleke (1979)、Liz Nissan (1987)、Bruce Kapferer (1990)、Michael Roberts (1997)、Tudor Silva (1990, 2000)、Susantha Goonatilake (2001)、Sasanka Perera (2005, 2014)、Siri Hettige (2010)、Siri Gamage (2014) 等人的著作。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聚焦于斯里兰卡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内在联系,并回顾特定地区中人类学和社会学者的既有研究。

## > 难舍难分的人类学/社会学

自人类学和社会学首次在斯里兰卡大学以学科的角色

亮相,已经过了60年。如今,社会学无非是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学科之一。斯里兰卡社会学的一大特点,是其与人类学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划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求学、受到人类学与社会学传统熏陶的学者,许多都会到斯里兰卡的大学社会学系所工作。我本身和许多其他斯里兰卡的社会学者一样,就是同时受过这两种训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斯里兰卡社会学/人类学家中,有很大比例的人是以斯里兰卡自身的议题为焦点,以国外为研究对象的比例则较少;其中当然也有些例外,像是 S.J. Tambiah 对泰国的佛教研究、研究几内亚和斐济植物园工人的 Chandra Jayawardena,或是以尼泊尔的亲属关系为研究主题的 Arjun Gunaratne 等等。从学科内容而言,人类学和社会学是难以分开的,几乎所有斯里兰卡的大学社会学系所,都在大学生与研究生的课程中融入了这两种学科的训练,无视了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界线。学生最终获取的学位是「社会

学」的。即便现况是如此,许多人也指出斯里兰卡国内所教授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和国际上对于这两个学科的理解,可能有着不同的标准。

## > 历史回顾

从历史上来看,斯里兰卡对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兴趣,在两个阶段开始蓬勃发展——人类学是在殖民时期,社会学则是在后殖民时期。相较于人类学和殖民统治之间的连结,社会学最初则是在美国的学术干预下于斯里兰卡发扬,这和 Bryce Ryan 在1950年代被任命为锡兰大学的第一位社会学教授,也有很大的关系。锡兰大学的人类学研究起源,则可以回溯到英国的殖民时期, Seligman 在1911年针对 Vadda 部落的原住民撰写的民族志研究。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时期,斯里兰卡的人类学研究是落后的。在斯里兰卡于1949年独立后,社会学便作为一个学科被引进,更在1959年时设立了首个完整的学位。1950年代中期,斯

里兰卡与国外的学者，产出了许多在民族志／社会学上有重大价值的文本；而这样的传统，后续也由许多学者的社会学／人类学工作承续，例如 Bryce Ryan (1953)、Ralph Peiris (1956)、Edmond Leach (1960, 1961)、Gananath Obeyesekere (1966)、Nur Yalman (1967)、Kitsiri Malalgoda (1976)、H.L. Seneviratne (1978)、Bruce Kapferer (1983) 等等。在斯里兰卡独立后，大部分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并没有直接处理斯里兰卡「民族国家」的新兴议题，反而是专注于种姓制度、亲属关系、土地所有权以及主流宗教等。

针对斯里兰卡进行调查的「外国」人类学家，多数来自英国、美国及澳洲的大学。这些外国人类学家对斯里兰卡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研究，有许多重要的贡献；然而他们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斯里兰卡两位最知名的 Gananath Obeyesekere 以及

S.J. Tambiah 所影响，这两位学者都是在顶尖北美大学的学术生涯中开始展露头角。在地的人类学／社会学传统，很大一部份就是建立在前述人类学家的基础上。后续由国内外学者、甚至身在外地的斯里兰卡籍研究者所进行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过去不被重视的新兴国内社会、文化问题，也提供了很大帮助。

### > 研究转向

1980年代起，斯里兰卡社会学／人类学的核心关怀，逐渐向社会中的群体暴力转移，开始关注民族宗教的社群，或是像边缘青少年这类弱势群体等社会内部 (intra-societal) 的暴力。后独立世代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如 Newton Gunasinghe、Siri Hettige 及 Tudor Silva 等，都对此领域颇有贡献；这几位学者都是在国外完成博士研究，并在回国后尝试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例如斯里兰卡乡村地区的不平等现象、青少年身份认同与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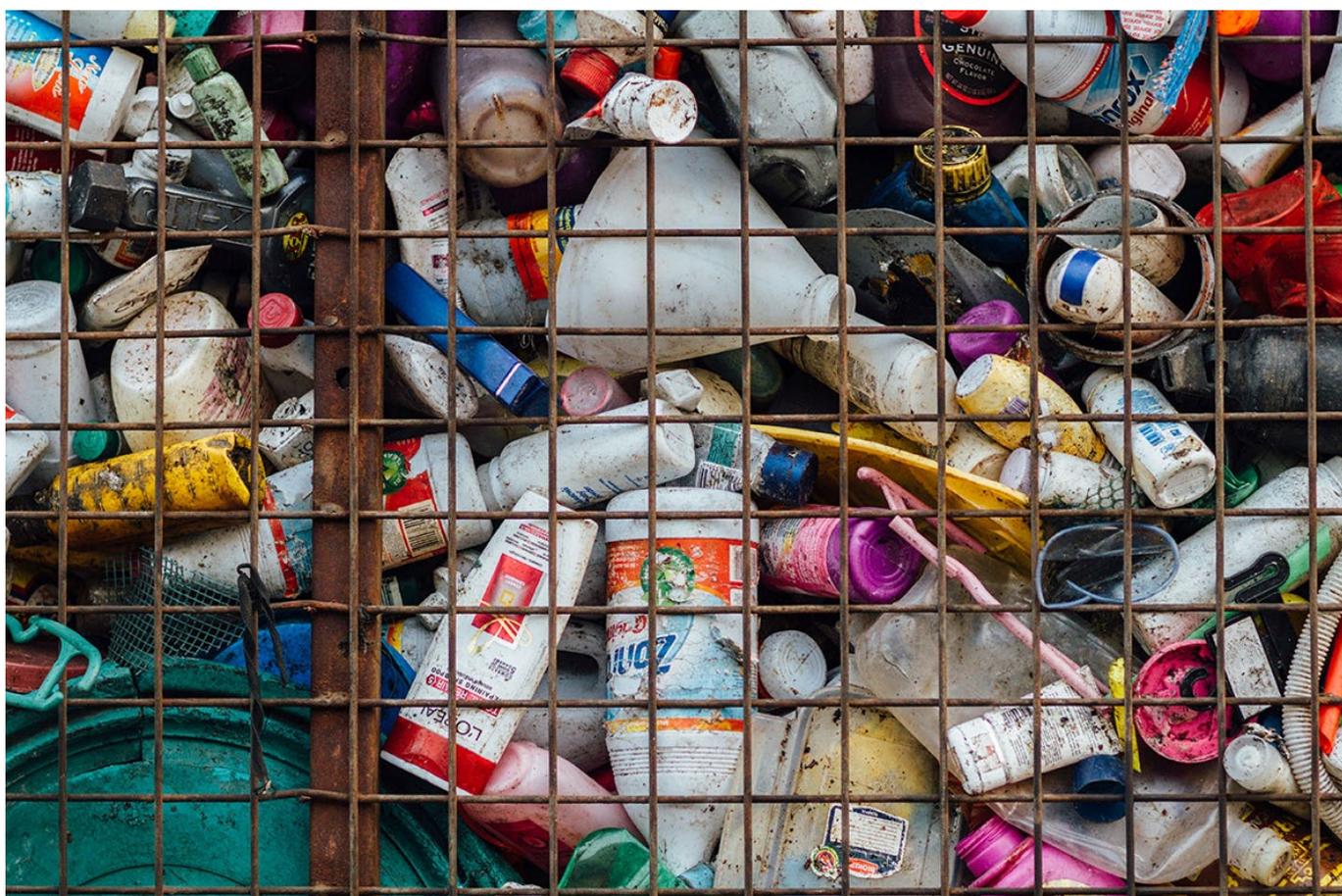
公共卫生等。不可忽视的是，社会学／人类学学者近年来的工作，在理论与方法论上，受历史悠久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传统影响甚深。

在这篇短文中，我尝试回顾1949年第一个社会学系成立至今，人类学和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研究／教学领域在斯里兰卡大学中的发展。现在的大学中，15间里面有11间设有至少大学的人类学／社会学科学位。人类学与社会学传统并存于教学课程、研究与出版品的现象，也以不同程度呈现在大学的系统上。必须注意的是，教学、研究和出版品的品质，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传统之间的连结程度，在不同学术机构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复杂且动态的在地／全球环境中设定一套共享的教学／研究／传播标准，将会是斯里兰卡的学术工作者所要面临的挑战。■

來信寄至：  
Premakumara de Silva  
<[prema@soc.cmb.ac.lk](mailto:prema@soc.cmb.ac.lk)>

# > 全球化与依赖性： 中国塑胶废弃物议题

Pinar Temocin, 广岛大学, 日本



菲律宾的塑胶废弃物。

来源: Adam Cohn/flickr.com. 保留部分权利。

**全**球化能够视为是在社会、文化与经济领域有着许多变迁的整体过程。不管从微观还是宏观的角度来说，全球化都影响了已开发/开发中的国家与区域。全球化透过挑战我们的生活带来重大变化。此外，由于新型态的经济治理，环境也受影响。

对于全球化下现实世界的关注，使我们能够看见支配的内在本质。全球化进程(或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发展出的依赖理论，阐明了国际系统是立基于经济上核心国家(已开发国家)与贫穷的边缘国家(开发中国家)之间的协调。在生态

周期中，我们看见依赖关系与资源开发间存在关联。而这也产生一种非线性关系，其中，开发中国家似乎在废弃物贸易中依赖已开发国家。我们可以将这些现象，视为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之一。

全球化透过加强经济连结，协助全球南方与北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但在考量双重轨迹的同时，这种关系变得比过往更加复杂。由此概念延伸，仔细探讨废弃物处理的分层等级(尤其是中国贫穷循环下的塑胶废弃物问题)将会是个理想的案例，来说明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

## > 中国塑胶废弃物议题

中国塑胶废弃物贸易(有些人认为是场危机)是新世界体系中依赖性如何运作的最佳例证之一。中国是全球废弃物工业中塑胶废弃物(作为可回收废弃物的主要目的地)的最大进口国与处理国,占全球市场的56%。

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可能会产生令人担忧的结构影响。废弃物出口国通过廉价的替代品,以及采取以眼不见为净的方式处理废弃物而非致力于回收,来消除废弃物成瘾的后果。更不用说,这些出口国既可以从这样的废弃物处理的分工体系受益,也能享有更好的环境条件。废弃物进口国(如马来西亚、越南、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等)则承受了对人民健康状况的危害、劳动剥削与环境污染等。更糟糕的是,废弃物进口国在经济利益的考量下,并无法建立有效的规范或控制机制来限制废弃物的进口。虽然废弃物贸易可视为开发中发展经济的大好机会,但经济机会与有毒的现状是存在冲突的。中国作为一个开发中国家,成为这种冲突中的白老鼠,在逐渐积累的毒物中影响了自身的环境与人口的健康,也因而侵犯了国民在健康、干净与安全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此外,这冲突也影响了工人的权利,因他们必须在相当恶劣的工作状况下,负责处理国外进口的塑胶废弃物。

透过废弃物的出口,已开发国家与工业国家(如美国、日本与澳洲等)的人民能够享受更干净、更受保护的环境与更健康的生活模式,而正与塑胶污染奋斗的中国工人、以及那些在塑胶回收部门工作而没有上学的儿童,都因为是塑胶废弃物产业的一分子而正在受苦中。因为已开发国家并没有致力于发展国内的回收工业和政策,选择眼不见为净的处理方式将废弃物处理到开发中国家,这最终导致了一个现象——贫穷国家在工业国家的自利与废弃物出口下,面临了社会环境的危机。

## > 结论

尽管过去几年来中国的经济成长似乎掩盖了塑胶废弃物回收的问题,但这仍然是一个全球化或全球不平等的重要议题,反映了长期以来废弃分类与回收管理的全球霸权。有着不平等效应的全球废弃物贸易,事实上并没有对废弃物进口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反而使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面临了回收战争与塑胶困境。此外,全球废弃物贸易亦反映了全球北方对开发中国家的控制,阻碍了全球南方在自身的发展上朝向更公平的世界秩序迈进。■

來信寄至:

Pinar Temocin <[pnrtemocin@hotmail.com](mailto:pnrtemocin@hotmail.com)>